



社區伙伴
Partnerships for
Community
Development

比鄰
泥土
香

2022

社区伙伴 编

韧性——比邻泥土香 2022

社区伙伴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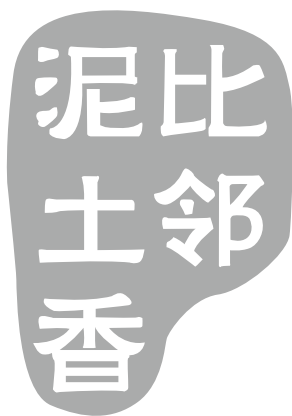
韧性

韧性

比邻泥土香 | 2022

社区伙伴 编





韧性——比邻泥土香 2022

(内部资料)

制 作：社区伙伴（香港）北京代表处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大街 42 号宇飞大厦 10 层 1016 室
电 话：010-85295578
编 委：陈宇辉、贾丽杰、顾晓峰、梁笑媚、邓文嫦
校 阅：结香 缪睫
封面设计：吴美玲
插 画：晏川
版式设计：陆迦莘
印 刷：广州百思得彩印有限公司
声 明：刊内文章仅代表作者的观点
网 址：www.pcd.org.hk
往期下载地址：<http://pcd.org.hk/zh-hans/content/> 比邻泥土香
(本刊使用大豆油墨及再生纸印刷)

在脆弱与坚强之间思考

（代序）

如果把时间拨回两年以前，我们能想象到，今天的世界会改变如斯么？

所谓的力量是什么，钢筋水泥是吗？屹立不倒的建筑是吗？让人闻风丧胆的武力是吗？在大自然的伟力跟前，人类的痕迹究竟算什么？也不必提那熔岩、地壳板块移动、风雨雷电、外太空陨石等极端例子了，想想荒漠上日复一日的风化，昼夜不停地被海浪轻拍的海岸线，钟乳洞里亿万年的滴水穿石，答案好像显而易见了。直径不到 200 纳米的冠状病毒，便能把掌握至高科技的人类弄得手忙脚乱、人仰马翻。而我们能否从这大自然的信号中吸取教训，看来还是未知之数。

在《消失的城乡边界线》中，作者高桥博之先生分享道，在 3·11 地震后，渔民跟他说他们并不恨海啸。那是一种因生命与大海深深连结在一起才可获得的感悟。当时有人倡议要在灾区筹建巨型防潮堤，高桥先生却认为这种“建设”虽然可能会为人类带来那么一点安全感（即便在大自然面前是那么多此一举），却会断开陆地与大海的交流，让大海变得贫瘠，进而无法供养人类。当气候变化变得更为猛烈且日常时，高桥先生、日本渔民们的这些思考对我们来说便不再是他方的故事，而是每个人都很可能要面对的生命选择。

在面对逆境、挑战及困难时，我们总希望自己可以更坚强，更能顶住困难，总期待能迎难而上，能尽快在跌倒中爬起身来。究竟这是所谓的复元力呢，还是一种我们拒绝接受变化、狂妄自大的执念？或者换一个角度去问，韧性、复元力与执着、不甘改变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别？老子教我们上善若水，民间智慧都知道要从善如流，如果我们俯首向大自然、向民间向社区学习，又能获得什么启发？

这一期《比邻泥土香》选择以“韧性”为专题，确实是因为世情的骤变，让我们很想透过伙伴们的文章，了解他们如何思考与应对改变，从他们的人生与生活智慧中学习一二。在“见·远”栏目中，我们以“空间设计与生活”为题，希望与读者们共同反思空间如何模塑我们的生活，进而探索空间打造又可以为生活带来怎样的可能。我们也感谢其他栏目的作者透过文章分享他们这些年的所思所感。本期《比邻泥土香》由陈宇辉、贾丽杰、顾晓峰、结香、梁笑媚、缪睫、邓文嫦编辑，同时感谢所有的作者和对本书编辑出版提供帮助的伙伴，让本期书刊得以面世。

当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时候，让我们真切地面对生活，以及我们与万物的关系吧。

目录

第一部分 专题——韧性

韧性：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找确定性	贾丽杰	2
守住回家的路：有感于贵州流芳村和黄岗村的可持续生活探索	陈韦帆	4
生态农业带我们回归自然	彭月丽	10
木兰花开：一个社工机构的自我探寻	木兰	18
我眼中的“韧性”	吉田俊郎	24
危机中的慈悲螺旋之舞	Kijtiwachakul Dhammanond	30

第二部分 见·远——空间设计与生活

前言		36
空间设计与公众参与	高健、林杰伦	38
谁筑乡村梦？从仙娘溪村的经验谈起	甘传、郭子怡、田蕾	44
树合苑的空间设计与生活	陈孟凯	52
回家	杨向若、王慈航	58
容让其他生物光临的建筑	阿乐	66

画与诗

生成	吴美玲	74
森之寐	玛丽·奥利弗	75

第三部分 行动者

让孩子在爱中成长的共养村	共学启动妈妈社群	78
半农兴村：深沟村的故事	杨文全	84

第四部分 解读

我的城和乡——读《消失的城乡边界线》	杨金	90
劳动合作社：做自己的主人	陈怡桦、陈郁玲	96
一些眼中有光的人——纪录片《信仰之岛》观后感	汪斌	102

第一部分

韧性： 在不确定的时代寻找确定性

文—贾丽杰

不确定性是生活的常态，尤其持续了近两年的疫情更加剧了这种“不确定”。危机牵引着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带来诸多深刻的反思。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找寻支撑内在的“确定性”，找寻重新建立人与自然、人与社区、人与人相互联结的道路。

现代人面对未知和灾难，往往不是把自己放回到生态系统中，而是把我们的安全感置于人定胜天的自信中。而当我们通过有机的适应去重新联结到一个相互作用的关系 / 系统中，我们更能够在逆境中复原、成长、自我更新。这就是这期专题想要分享的话题：韧性，或者复原力。

专题不强求弄明白“韧性”的学术涵义，而是从自然、文化、人与人的关系、内在力量等不同维度去探索“韧性”。这期专题，我们邀约到五位伙伴与我们分享关于“韧性”的体悟与思考。

首先，我们想分享传统社区如何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做出选择，传统文化、老品种保育和传统的生活方式等在社区生活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又将何去何从。本文作者是社区伙伴农村团队的韦帆，她多次走访贵州流芳村和黄岗村两个侗族村寨，在与村民的交流中尝试理解他 / 她们的视角。面对文化冲击带来的社区问题，我们相信当地人自己有足够的智慧去应对，而传统文化正是他 / 她们的根基和资源。

第二篇是从生态农业内生逻辑和农人内在力量的角度来谈“韧性”，因为生态农业技术的原点对农业生态系统的观察与学习，当农人用整全的生命视角去认识农业的自然规律，就可以让很多事自然地发生。编辑在跟月丽约稿时聊起大自然的“韧性”本质这个维度，月丽多年来从事生态农业的体会不断地丰富这个话题的内容，于是一拍即合策划了一期“笃农家共学舍”线上对话活动，邀请田间学校网络中经验资深的农友郭锐和李立君参与对话。两位农友在对话中分享了很多生动的田间观察和生活体验，再加上月丽穿针引线的提问和解读，让整晚的交流充满能量感。在这基础上，月丽精心准备了这篇稿子，希望与更多农人和朋友分享生态农业的内在逻辑与魅力。

“木兰花开”是在北京城边村的一家基层社工机构，它是很多打工女性在北京的一个“家”，是她们在艰辛生活中可以抱团取暖、互相安慰的心灵港湾。这篇文章的作者丽霞是机构发起人之一，她的生命经历与“木兰花开”交织在一起。文中诸多艰辛，是她和团队这十二年里经历的风风雨雨，也让我们看到打工女性群体真实生活的缩影。丽霞身上有股“不服输”的劲儿，她在一次次困境突围中不断认识自我，也看到每个个体的力量与价值。她把“木兰”比作小草，小草虽弱小，但有倔强的生命力，它的力量来自大地。

最后两篇文章分别来自日本转型城镇运动的推动者吉田俊郎先生，以及与社区伙伴有多年深厚情谊的泰国 P'Nit 老师，他们分享了海外网络中的一些“韧性”经验。所谓转型城镇（Transition Town），就是面对石油峰值、气候变化等危机，当地人通过创意和努力，最大化活用当地资源，向永续型社会转型的草根运动。在 2011 年日本发生“3·11”特大地震灾害后，吉田先生迁居到转型小镇藤野¹，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开始以与自己小小的身量相符的尺度生活”。在藤野，人的创造力被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当人发挥出美好的特质，相互信赖、相互帮助，就在创造一种具有韧性的社区生活。P'Nit 老师的这篇文章，读来有种内心被慢慢打开的感觉。疫情期间，大部分人通过自我隔离和防御以求自保，人们在一波接一波的疫情中感到无力、沮丧、焦虑、恐慌或者麻木。P'Nit 老师是少数有勇气对“苦难”保持敏锐感知和清醒觉察的人。她分享了疫情下的两年自己经验到的深刻内在转化，以及支持社区和他人的疗愈行动。当我们以慈悲的方式对痛苦保持开放时，我们会体验到与所有生命的同在，这份清明的觉察正是疗愈世界的力量。

对编辑团队而言，每一次专题制作都是一次探索之旅的邀约，我们由衷地感谢伙伴与朋友的真诚分享与信任。借由“韧性”这个话题，让我们相互联结在一起，用内在的爱与智慧去迎接我们继续充满不确定的生活。

■ 贾丽杰 社区伙伴城市团队项目官员。

1. 藤野位于神奈川县，离繁华喧嚣的首都东京 55 公里，是日本第一座转型城镇。《比邻泥土香》第 10 期的文章《在转型的小镇呼唤爱》曾介绍藤野的转型故事。

守住回家的路：有感于贵州流芳村和黄岗村的可持续生活探索



早年前，我就通过阅读《当文化反思遇上农业：协作者札记》，初步认识了贵州黔东南的流芳村。加入社区伙伴之后，因为一些项目工作而进一步认识了流芳。流芳村地处贵州黔东南黎平县茅贡乡，是一个在国道旁依山傍水的侗族村寨。村寨中的骨干从2005年与社区伙伴合作前，就已经在探索生态种植稻米。在不同伙伴和流芳村生态种植团队的共同努力下，以及借着地方政策的推动，流芳村成为了茅贡镇的有机大米种植基地。不过在流芳村的探索中，最让我感动的还是村民们在其日常生活中对可持续生活和社区韧性的理解，并找到了自己的核心坚持。

到访流芳村时，我通常会住在吴会长家，这期间我和女主人石阿姨有很多有趣的对话。我和石阿姨一起做过纸，做过传统的三月粑粑，更多的时候是一起做饭。一起劳动的时候，阿姨经常提到的一个词是“安全感”。

每当我问：“为什么要种有机稻米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自己种的米吃起来放心又好吃。”

我问：“为什么你们那么喜欢种老品种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自己留的种子不怕种不出来，不怕没有吃的。”

我问：“为什么要做腌鱼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哪怕没有现金买烟，也可以送礼还礼给人家。”

我问：“为什么要用竹编的筐子而不用塑料袋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劳动辛苦，需要好用的工具，而我们坚持，才有会做工具的人，也才有方便的劳动工具。”

我问：“为什么还要从纺线开始织布染布做衣服啊？”

阿姨答：“因为有安全感啊，自己做的衣服穿起来舒服又方便，也很好看。不穿侗族的衣服，就不是侗族人啦。”

妇女团队的另一位核心成员英时姐也跟上节奏，在参加姐妹工作坊讲起“妇女眼中的美好生活”时，反复强调：“要有土地啊，因为有安全感啊，没有土地的话，总觉得生活是飘的。有土地的话，就像种子落到土里，无论如何都可以活下去。”

说得多了，我们半调侃流芳村可以主打品牌“有安全感的生活”，因为在地有田，有能发芽能抗灾的老品种，有干净的水源和土壤，也有能生产工具的工匠手艺。但抛开外人的眼光，在流芳的妇女团队看来，“安全感”就是一个囊括了衣食住行生活百事的指标体系，是让大家能够“进可出外赚现金，退可回村过生活”的关键。大家当下各方面对“安全感”的坚持，也是为了守护可以这样自主选择的空间吧。

除了满足生计生活需求之外，“安全感”也有关系层面的含义。2021年2月的时候，石阿姨和妇女团队的其他几位成员招待我们一起制作“清明粑粑”。在流芳的传说中，清明粑粑是纪念和感恩燕子的一种传统糯食，也是女儿献给母亲的感恩礼物。每逢三月三之前，全家的女性都会聚在一起制作，之后带给自己的母亲。虽然我们当时并不是节日期间，但妇女们商量后觉得正好清明菜（鼠须草）冒出了新芽，适合让我们一起来体验制作过程。于是大家提前去山里找到了甜藤（村寨附近一种野生植物，是传统的甜味剂之一），摘来了清明菜，准备好了流芳自种的有机糯米粉，带上外来的我们开始制作。从手工捶打甜藤和清明菜，泡水过滤和糯米粉，一直到捏成粑粑进锅油炸，整个过程完成之后，作为协助者的我已经腰酸背痛，巴不得躺平。想到这一整天的劳动还不包括外出寻找原材料的时间精力，我完全抛却了自己身为“可持续生活”项目工作人员的自觉，有气无力地问仍然在干活的姐姐们：“要花这么多力气来做这种零食，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啊？”

答案当然还是：“因为有安全感啊！因为外面的零食吃起来不安全也不好吃。还有，一家人来做三月粑，大家边聊天边做，也是传承我们侗族的文化啊。”



听到这个熟悉的词，我开始回想自己参与制作时挥汗如雨的过程。如果将仪式般的情感投入其中，确实会让人通过亲身劳动的过程去体验和感恩，无论是感谢燕子为侗族人带来杉树种，还是母亲为女儿付出的心血汗水。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个深度生态学¹中的“感恩”环节。而通过家庭中所有妇女的集体工作过程，以及不同小家庭之间的礼物交换流动，也让村寨整体拥有了更强的联结感。对于流芳的妇女们来说，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感也是“有安全感的村寨”的重要指标之一。

不过流芳村并非世外桃源，现代与外来的挑战日渐渗入。人们的每个取舍之间，坚持与代价并存。社区伙伴和村寨团队深耕多年，也还在经受现代化对村寨的挑战。先不说吴会长和石阿姨的儿子作为新生代文化传承者，为了生计还是必须往返城乡。村寨内部的礼物流动体系，也逐渐从腌鱼、稻谷为主，变成了买烟买酒的现金流动。石阿姨感叹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出外打工，包括妇女团队也在想办法去县城卖菜，可能也是因为现金花费越来越多，大家逐渐无法维持自给自足的生活。尽管如此，妇女团队和会长一群人仍然在坚持有机种植，希望在有限的空间中多开拓一些选择的空间。比如会长仍然坚持让孩子们农忙时回家一起劳动，比如妇女团队虽然人员时有外出打工，但坚持下来的人也会帮外出的人种几块菜地，让大家出得去也回得来。而寨老们察见村中现金送礼攀比之风渐盛，也与村民一同明确了村寨的人情礼物往来的标准，以平衡当下消费主义对村寨关系的破坏。

在我看来，也许流芳村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小系统，流芳村民们不是不明白有些坚持背后的代价，也不是淳朴地不去计算得失，只是因为大家衡量成本的时间维度不止于当下一代，而是愿意看向更远处的后代子孙。也因为传统文化提醒人们，只有能够回头的路，才会是一条长远的路。

曾有一段时间，我也疑惑：社区韧性的另一项重要指标就是自给自足的生计生活，然而在当下这个时代，在外界挑战频仍的情况下，还能让生活的大部分物质都通过社区内部系统来提供吗？如果不能的话，到底如何去理解社区韧性中“自给自足”的现实意义呢？

另一个侗族村寨——黄岗，则让我看到了一个看似异想天开的应对：村寨至今还保留着物物交换的风俗，以作为现金交换体系之外的另类选择。黄岗也是贵州黔东南黎平地区的一个古老侗寨，和流芳情况不同的是，黄岗的地理位置相对隔绝一些，因此也被外界称为遗世独立的侗寨。其实我们在村里走访时，并不觉得村民是“隔绝的”，毕竟外部乡村振兴的很多资源几年来纷纷进入黄岗村，黄岗也是游客钟爱之地。但日常生活中，除了节日期间，外来人确实想买碗粉都需要提前预约。如果想在黄岗吃饭，没有村民愿意接待的话，有现金也没啥用。有了数次饿肚子的经历后，我们才搞清楚，房前屋后都是鸡鸭鹅，田地里都是瓜果蔬菜的黄岗并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村民不习惯用食物换现金的行为。听老人说，侗寨的习惯是要留够三年的稻谷，余下的才会想到往外卖，而黄岗在这个习俗上似乎特别执着。村寨团队以成龙大哥为首，认为保留住自己祖先传下来的糯稻品种不仅能够让村民“回得去”，也能够让大家在当下保持独立性。而保持对现金的较低依赖度，不仅是对传统习惯的延续，某种程度上也让村民多了现金以外的选择空间。也因为还有以物易物的习俗，比较而言，黄岗外出打工的人较少，且选择的都是季节性的短期工作。虽然看起来在黄岗的生活不那么“方便”，旅游业发展起来也没有那么“顺畅”，但似乎村民的生活幸福感也并未降低。

也正是在这样的另类坚持下，黄岗团队才能在面对纷至沓来的研究者、乡村振兴者、非政府组织和旅游者时，始终保持反思能力。有一次我问：“外面这么多研究者来调查黄岗，每次都是你来带领，你们自己还有兴趣和村民一起来做调查吗？”成龙大哥一改平时笑嘻嘻的表情，非常严肃地回答：“我带很多外来的人一起调查村寨，但后来发现好多人都不会给我们反馈调查的成果，甚至我需要的时候，还有人让我自己去花钱下载。只有我们自己调查的东西，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摸着良心想了下自己会怎么做，勇敢再追问：

1. 深度生态学 (Deep Ecology) 是由挪威奥斯陆大学科学家安·奈斯 (Arne Ness) 开创，他提出，传统生态学将人的位置置于自然之上，而传统环境保护也过度强调人的力量。奈斯认为，根本的转换应该发生在人抛弃人类中心主义，作为众生的一个部分，重新回归自己的生态位，同时人也需要重建自身与大自然的联结。梅西 (Joanna Macy) 据此发展出了一套螺旋型的行动者培力方法，即“感恩-拥抱我们的痛苦-大转折-继续走”。

“那为什么你们会想自己调查啊？感觉黄岗的文化已经传承得很好了。”成龙大哥回答：“其实我们自己知道有好多东西已经危险了，需要赶紧找回来，不然就要丢了。我们这一代如果丢了，下一代如果谁还想找回来就难了。我们学侗歌也好，种老品种也好，都是希望孩子们想回来的时候，还有可以回来的选择。”

这些振聋发聩的话不禁引发我深深思考，如果说社区韧性有一些显性的呈现，例如可持续的食物、种子与技术、社区互助网络和行动，那也有一些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隐性呈现，例如村民的“安全感”、传承文化的内部动力，以及在主流之外的另类价值观。这些隐性的呈现，犹如长在土地下的根系，正是支撑外显的知识和行动的重要基础，也是让社区能够在外界挑战的风雨中，始终有反思有选择有回头路的主体意识。

另外，黄岗的中青年村民团队也让我看到了社区韧性的另一个维度：以行动者主体反思为前提的，向外学习的好奇心。在我的印象中，黄岗村团队的传奇在于实际承担了很多外部资源进入村寨的“管道”，同时也有很多机会外出学习和参访，但仍然保持自己的判断和选择标准。在外人看来，眼花缭乱的项目、参访和培训主题各异，我好奇团队是如何认知和选择的。而每次和团队不同成员聊到外出学习，我又似乎总是能够看到不同个体的新想法和新成长。最难得的是，这些新的学习总会回到团队在村里的思考和行动中，而不是泛泛地走了一圈而已。“去外面看回来的东西，在我们村能做什么？”似乎是这个团队每次学习之后的关切点。我曾问过团队中的妹妹汉美，她为什么想参加一个妇女为主要行动者的项目，记得汉美告诉我：“出来和不同村寨的姐妹交流，就可以看看别人是怎么做的，也可以交流经验，回来想想我们可以怎么做。”“看到大家做的很多都不同，也会反过来想想我们可以做哪些更多的。”这样的学习和转化动力，确实让我钦佩。也由此提醒我，拥抱祖先的智慧并不是墨守成规，而是可以结合外出学习相互促进的反思与取舍。

行文至此，我才惊觉自己从流芳和黄岗村民团队的身上学到的，比我想象中的更多。让我深省的是，所有那些或宏大或抽象的概念如“社区韧性”、“可持续生活”，也许不过是为了让我们觉察到自己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惯性视框，试着重新回到生活的整全中，去寻找行动和意义的支点。放下头脑里的概念，当我用身体的感知去描述流芳、黄岗等村寨时，我会想起脚底踩在山林土地的舒展，深夜里不知疲倦的蛙声，灶上朦胧的柴火香，黄白的米饭上卧着的

艳红腌鱼，不知不觉伴着笑声歌声下肚的米酒，在手指摩挲中越来越随和的棉布，充满温柔安慰的大树，总是弥漫清香的杉木楼房，鼓楼里暖到深夜的火堆，晨雾里响起的织布机和槌布声伴随着的欢声笑语……能留在我们身体里的，吸引我们去为之坚守的东西，也许从来都如此简单。而对于生活在村寨中的人们来说，守护自己心中的美好，并不只是经营祖先留下的家园，同时也是在创造未来子孙的希望。在每个认清代价的坚守背后，每个对即时便利与长久关系的平衡背后，行动着学习着思考着的村民们不仅仅是在守护当下个体的选择空间，更在努力守护那一条，让自己和世代代都有机会可以选择的，返回家园的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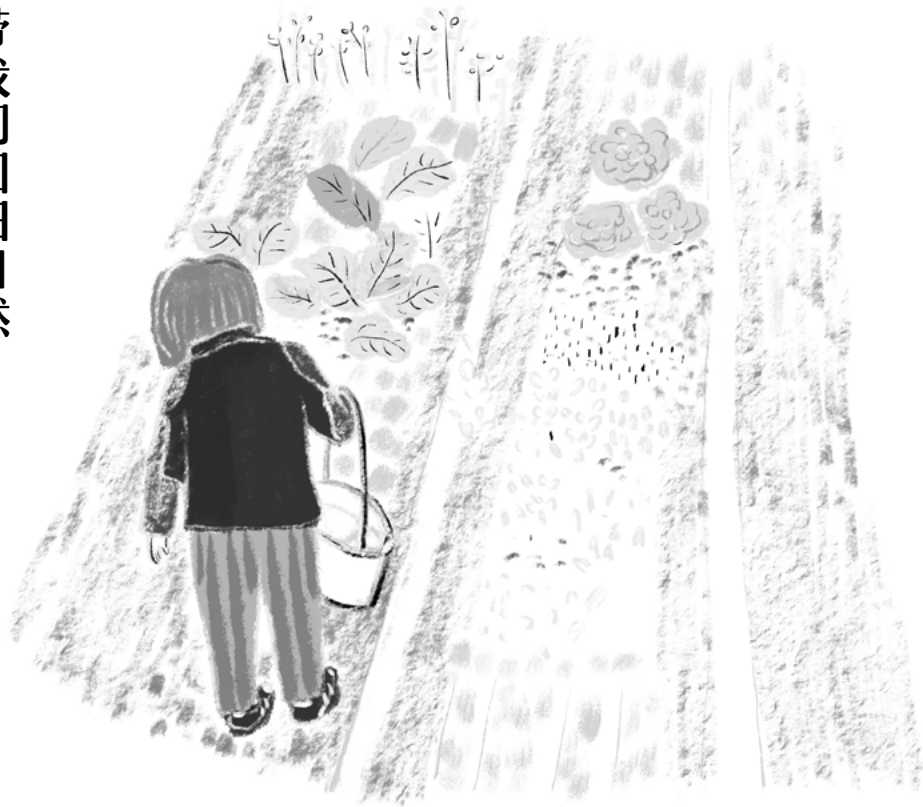
■ 陈韦帆 社区伙伴农村团队项目官员。

本文根据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组织的“笃农家共学舍”线上对谈活动——“生态农业内生逻辑”整理而成，参与对谈者有彭月丽、李立君¹、郭锐²。社区伙伴的贾丽杰亦参加了本次对话的策划。

从事生态农业十年，认识了很多返乡务农的新农人，发现返乡务农的新农人往往都要经过一个过程：首先就是接受农业和土地的洗礼，会从热情饱满的“田园梦”状态被浇一头冷水，然后有的人清醒了，踏下心来在土地上耕作，慢慢地脸上再度浮现笑容，活得轻松自在，农场也起死回生，风生水起，面对困难挫折，更具韧性；更多的人是被浇趴下了，掉头走了；或者有的人不愿意接受现状，活在自己的梦里，用虚幻装扮自己，面对外界变化以及不一样的声音表现非常脆弱，自怨自艾，倒是也有部分人“买账”。这篇文章比较关注第一类人是如何活出笑容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往往会发现土地和人的状态惊人地保持一致，人的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土地的状态也越来越好，不知道是人带着土地在修复，还是土地带着人在疗愈。

生态农业带我们回归自然

文一 彭月丽



异化的农业、异化的农人

我从小在乡村长大，小时候跟着父母干农活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草、锄地、割麦、播种等等都干过，后来上大学也是学习农业专业，感觉一直没有和土地断了联系，也隐约感觉到土地、土地上的人以及土地和人之间的关系一直在变化。

二三十年前，我印象中我爸妈对地里发生了什么是非常了解的。我妈去到地里看到一棵作物有什么变化，她就知道什么原因，因为她每天都来，跟作物很熟悉，自己做过哪些操作也很清楚，或者是这棵作物小时候经历过什么，她都知道。

后来，农民看见有虫子或者作物长得不好，第一个想到的是找农资商买肥料或者农药。大家也不知道该用什么，农资商推荐什么就用什么，很多时候会一下推荐好几种，最后也不知道哪一种有效果，怎么起的效果，他们开始失去自己的判断力。因为农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用了之后产生了问题，也还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只能再去找农资商。就是这样农人逐渐失去主动权，农民不再能掌握农地里的情况，陷入恶性循环，人与土地的联系越来越弱，甚至除了播种、打药、收获，人们都不再去田里，对食物的认知也越来越少。

化学农业无疑是对人的一种异化，让人只能用农药、化肥等农资去做农业，农人变成了化学农业其中的一个环节、一个工具。

生态农业是重现多样化生命的生态系统

我们知道，太阳光是一切生命能量的来源。地球上只有植物或少数微生物能够直接吸收光能，植物的光合作用就是植物叶片把太阳能转化成了有机物中的化学能量使之进入大自然的生态系统。动物吃植物或者食物链中的高级动物吃低级动物，微生物吃植物、吃枯枝落叶、吃动物粪便遗体等，生态系统中的食物链本质是物质、能量的流动。能量是核心，物质是能量的载体，能量需要固定在物质中才能被储存在这个系统中。农业生态系统的本质也是自然生态系统，只是通过人为管理影响系统能量的抓取和分配问题。怎么把

1. 李立君，立君生态果园负责人，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硕士，2010年开始学习有机农业，在有机苹果课题中取得突破，实现了有机苹果亩产9000斤以上。多年致力于将农场与自然环境融合，实现生活、农场与自然的深度结合，为可持续农业发展提供一个可借鉴的案例。

2. 郭锐，银林生态农场负责人，华南农业大学生物科技专业学士，2008年返乡创业，和伙伴一起创办银林生态农场，2013年转为生态种植，从关注产品产出到回归土壤的保护和培育，致力于可持续农业发展。2016年和一群新农人成立银林生态社区，关注可持续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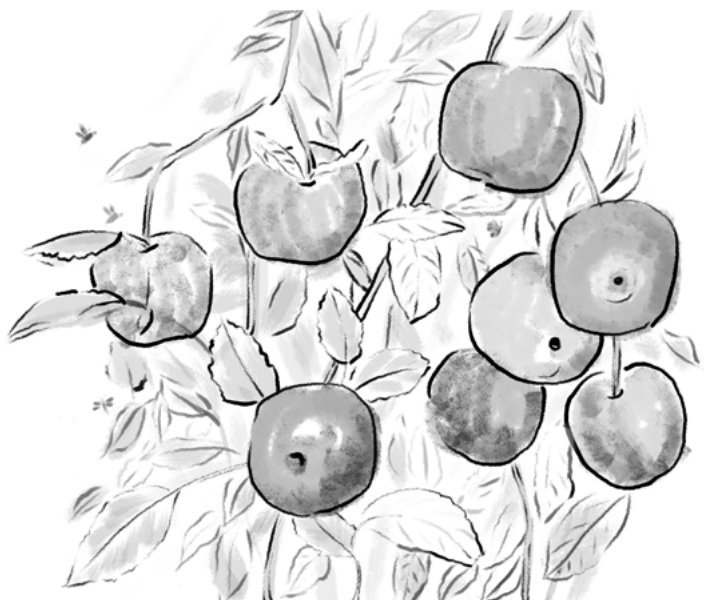
能量“抓取”到农业系统中，在保持农田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多一点分配给人类，是生态农业的目标。

我们生态农友群最近几个月在线上的“笃农家共学舍”（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组织的围绕可持续农业的读书会）共读《植物生理学》，其中有很多对植物微观生理活动的认识，大家深刻地感受到植物是活的，她完全有自己的生存策略以及应对逆境的生理机制，她不是独立存在的，她和周边其他生物有重要的相互依存的生命关系，和周边的环境要素中的太阳、大气、水、温度与土壤等都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而现代农业往往忽视这些，强势粗暴的生产管理操作切断了植物与这些生物、非生物要素之间的自然循环机制，让植物失掉自己的主动权和依靠，只能按照人类的需求和想法去生长，结果，植物不再是植物本身，结出的果实也不再是自然的味道。

植物和其他生物之间是合作共赢的关系，但在常规农业当中，一般是眼睛只盯着作物，把田间的其他一切生物视作“敌人”，或者认为它们之间没有关系。因此，很多农田里只有作物，没有任何杂草、昆虫，然后慢慢地土壤板结，土壤微生物也难以生存，农作物成了“孤家寡人”，只能仰赖人工施入“化肥、农药”维持着生命。这是让系统的生命变少的方式，而生态农业是让系统的生命增加的。生命增加就好像让一个大家庭有更多的成员，创造更多的价值；而生命减少的系统创造的价值当然越来越单一，最后就变成依赖人去投入农药、化肥，植物才能生长。

我们可以以自然状态下的土壤为例，理解土壤是一个由丰富的生命组成的系统。在农业生态系统中，植物制造了有机物变成叶子、果实等我们人类可以收获的产出，它们的枯枝败叶可以被昆虫或动物吃掉，微生物可以继续把动植物残体等有机质转化为腐殖质到土壤中，相当于把有机物的能量带入地下，滋养土壤里各种生物，加快能量的转化、储存；与此同时也在改善土壤环境，让昆虫、微生物和植物根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植物根系有很强的穿透力（不同植物力量大小不一样，一些常见的深根系绿肥常被用来改良土壤结构），能够打破板结的土壤，配合微生物的活动，从而创造更深、更广的土壤空间。伴随着土壤结构的改良，土壤能够储存更多的水、肥（有机物和矿物肥）、气、热，从而能够养活更多的生命，使得土壤生态系统逐渐升级，拥有更多抗逆境（旱涝等）风险的能力。这就是老农们常说的“地力”的内涵。

从上述自然土壤中的生态系统发展案例我们可以看出，每个生



命生存都需要一些环境资源要素，而这种生命需要的满足不是通过“掠夺”实现，而是通过和更多的生命和非生命的环境要素合作来实现，相互成全，培育共同的家园，这样形成的生命共同体反而抗风险能力更大、更具韧性。这是一场系统的、整体的进化——依靠农业生态系统内多样化的生命循环的协力，这是生态农业不同于化学农业的根本内生逻辑。

生态农业与在地生态系统

生态农业需要遵循“适时、适地、适种”的原则，首先要了解当地的生态系统，比如这块土地的土质、当地的气候特点、当地的物产以及耕作习惯等，然后选择适合当地环境的作物适时、适地去种，这就是遵循自然规律，这是基础。观察当地的自然环境也是了解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渠道，这些是当地土壤、气候逐渐发展呈现出来的，可以告诉我们很多信息。

两位农友在分享中提到很多有趣的观察。李立君注意到，有的果园周边是常规的果树，有的果园四周是林地，还有的果园周围有弃耕的农田和自然植被，结果周边自然植被好的生态环境给他的果

园“提供”了很多瓢虫、食蚜蝇和螳螂等昆虫。说到杂草，一般农友会想尽办法把草除掉，让菜能够长得更好。郭锐在种青瓜时发现，雨季把草除掉，青瓜往往很快就会死——原来把草除掉后，土壤被雨水冲击，导致表面板结、不透气，而青瓜根系很弱，不透气就很容易烂根，所以除草之后会长得更差。杂草茂密的根系可以保护土壤结构，让土壤环境更稳定，透气性、排水性更好，还能防止太阳暴晒。原来我们一直把草当敌人，其实它可以成为很好的帮手，让我们的菜长得更好。

当地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生物库，做生态农耕可以从当地的自然系统中获取生物的支持，包括害虫、天敌（瓢虫、食蚜蝇、寄生蜂等）等。立君的果园最初棉蚜很难解决，从春天繁殖到秋天，但是种了野豌豆两年以后，因为野豌豆有很多的花蜜，可以提供给蚜虫的天敌瓢虫、食蚜蝇、寄生蜂，这样棉蚜的问题几乎就解决了。病虫害的发生有时候不是坏事。有一年，立君的果园有一片果树长势很旺，发生了棉蚜，结果让棉蚜啃噬了的果树，树势转为中庸，更容易开花坐果了。所以，病虫害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它们是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有过剩的营养需要转化它们就出现了；病虫害也是带给人信息的重要“信使”，提醒我们哪里做错了，要做出怎样的调整，这是需要农人认真“阅读”的，读懂了，我们的农业管理水平就提升了。

在生态农业中，可以经常观察到许多自然的信息，当我们认真地与自然互动，就会收获信心与惊喜。

有韧性的农耕——应对气候环境变化

很多农友提到，这几年气候异常是挺大的挑战，比如高温、干旱、暴雨、寒潮等等，频频看到农业受损的报道。而另一方面，农作物品种对于逆境的抵抗力也是达到了历史最低，这源于我们的作物经过长期的育种——特别是近几十年育种的进度非常快——再加上人的呵护、化学农药的“保护”等，作物品种本身的抗性就很低。立君提到，从事生态农业很大的挑战是农作物被“惯”坏了，经过长时间的育种和农药呵护（当代作物育种往往以高产、质优为育种方向），在自然界中难以立足，好多缺点并没有通过自然的选择筛除掉。

关于育种，我们看到很多生态农友已经在行动，选择更适合本地环境的老品种，或者通过自留种选择更有抗逆性的品种，都是增加农业韧性的方式。

另一方面，重视生态环境和土壤复育的生态农耕方式本身也在增强农作物应对逆境的能力。郭锐认为农业的韧性主要体现在土壤上，气候我们没办法掌控，但是我们可以增加土壤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如改良土壤，让它的结构更好、耕作层更深厚，作物能够长得更好、更健康、抗逆性更强。郭锐的农场地势较低，雨季经常有水淹的情况，以前淹过之后菜都会生病或死掉，但经过几年的生态种植，2019年水淹后，过一段时间菜又恢复正常生长，这给了他们很大信心。这是因为之前土壤比较板结，雨后空气很难进去，根会腐烂；改良土壤之后，土壤的排水性、透气性有了改善，水一退，空气就能进去，所以对作物的影响就会小很多。这个就是土壤的韧性。

西安的沃野青青生态农场，因为几年的土壤改良与生草栽培，在常规种植的果园蚜虫发生很严重的月份，他们的桃园几乎没有看到蚜虫，反而看到很多瓢虫、食蚜蝇等蚜虫的天敌。再如前文提到的立君果园种野豌豆和多种花草抵抗棉蚜的例子。这些让我们看到，农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可以抵抗和缓冲许多外在压力和不利因素，生物多样性越高，系统越稳定，这就是系统的韧性。

生态农人：自然地生活，回归本真

访谈围绕“人和土地的自主性”的话题，两位农友分享各自的生活体悟和思考。郭锐说，他做生态农业前几年是比较焦虑的，感觉做了很多年还看不到盈利，压力比较大，总想着怎么让农场能够收支平衡。人的状态也比较紧，会想得很多、很忙碌。后来有一年到泰国游学，发现当地的人做生态农业的出发点是为了自己的生活能够更生态一点，能够吃得更好，能够少去接触农药、化肥，让身体更加健康，他们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围绕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那时候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回来做农场的初心也是为了过更生态的生活，只是后来因为经营压力而忽视了自己的初心。自那之后，他慢慢在调整，更多地去关注生活方面的事情，这两年整个人的状态会比较放松一点，经营的状态也更好，工作的时候也更享受、更投入。

“我很喜欢耕地，感受到犁和土壤之间的互动，了解土壤的状态，感觉很幸福，很满足。”郭锐说。

回看这几年的经历和感悟，他说：“真正了解认识自然规律对生态农人来说很重要，但我觉得除了对技术的学习跟掌握以外，对自身的认识和对生活的认识也可以提升我们的内在力量。我之前更多在关注生产，那时候是缺乏力量的，当我们关注自身生活的时候，感觉是很不一样的，也可以让自己更有动力地去做生态农业。处理好跟家人、朋友、同事、客户的关系，也能够从他们身上获得力量，让我们更好地坚持走这条路。”

立君在分享中说到，做生态农业就是回归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首先要照顾好自己，关注自己的成长才更容易去滋养到别人，“就像生态系统某个环节的功能正常的话，自然而然地就可以滋养到其他环节的功能，系统就会转得比较好”。对于现在的生活，立君说自己现在越来越“自私”，主要精力花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让自己对农业的理解更深入，在调控农业的过程中能够更游刃有余，有足够的内生力，能在社会中有自己的立足点，对社会的价值也会更大。

结语

我们认为农人的自主性是指农人面对自然现象有自己的独立观察、认识跟判断，能够根据当下的情况，做出合适的决定。这种自主性建立在清晰的认知基础上，能够在不断的观察自然、学习与实践的建立自己对农业的认知，并且具有开放性，能够不断在遇到新的状况或者理论、技术的时候，融会贯通，不断拓展自己的认识、提升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样的农人不会迷信某一种“农法”，能够客观地看待、分析，回归到技术的原点——“自然规律的原理”层面看待某一项技术，然后靠自己的实践去验证，知行合一，形成自己独立的观察和判断。

池田老师³认为笃农家具备四种基础能力：观察力、判断力、洞察力与应用力。“我觉得这也是形成农人自主性的基础和路径。而与同行者的互助、陪伴、交流，无疑是一种很大的支持力量，我



们做‘笃农家互助共学网络’的初心也在于此。大家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同行者网络，互助共学，照亮彼此前行的路。”

而有自主性的农人要去做的事即是再现土地的自主性。土地自主性不只包含土地，也包含土地上生物的运作规律，前文提到生态农业原则中的“适时、适地、适种”，其实就是尊重土地的自主性。而人如果不考虑土地是不是适合，只是看到哪个赚钱就去种哪个，这就剥夺了土地的自主性。我们希望再现土地的自主性，即是允许土地和植物按照自身的规律去成长，农人们只是顺应自然规律帮助土地和植物自主、健康地成长，不把人的想法凌驾于自然之上。

《中庸》有这么一段话：“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我觉得这段话用来描述“自主性的农人”很合适。我们生态农人首先是要对自己真诚，活出自己想要的生活，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即是活出自己的幸福与喜悦，这样才能真正地影响到身边的人，影响身边的人活出幸福与喜悦。当我们能够活出这份喜悦的时候，也更能观察和感受土地与植物的需要，了解自然规律，然后才能帮助土地与植物活出它们的完整性，这不就是“参赞天地、化育万物”嘛！

当人和土地的自主性都找回来的时候，就是和谐共生的天地了。

■ 彭月丽 毕业于山东农业大学，曾任职于沃土可持续农业发展中心，多年来致力于土壤改良与生态农业推广，发起田间学校，组织生态农业共学，主持编辑《可持续农业》。希望连接城乡伙伴，为大地复育助力，共创自然而丰盛的可持​​续生活。

3. 池田秀夫，日本福冈县人，生态农业专家，致力于土壤改良与堆肥制作技术推广。20年来，行走在中国乡村的田间地垄之间，传播与推广土壤改良与可持续农业的理念与技术。

木兰花开：一个社工机构的自我探寻

文一 木兰

我是河南开封人，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女子。很多人会脱口叫我“木兰”，是因为一时想不起我的名字，我不介意，很喜欢“木兰”这个称呼，因我和木兰几乎分隔不开。木兰 2010 年刚成立时，我就吃、住、睡在木兰的任何一个活动中心之中，生活和工作完全不分。我和木兰几乎融为一体，无论是从外界传播，还是从我自己的时间、精力的投入而言，都是如此。

我只是木兰的创始人之一，当时我们 4 位女性一起创办了木兰花开，张睿、张春芬、赵忆帆和我，几乎是一拍即合，都身为流动女性，更能感同身受基层女性的弱势地位和面临的困境。

我们咨询了很多朋友，自己也想了很多名字，最后机构定名为“木兰花开”，是因为我们把“花木兰”和流动女性做了一个比较，发现很多相似之处：第一，都是女性身份；第二，都是远离家乡；第三，都是为了支持家庭，花木兰是替父顶弟从军，一个一个的流动姐妹是为了减轻家里经济压力，甚至是为了支持哥哥、弟弟们读书，成了家庭的经济支柱；第四，都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些姐妹们的劳动汇聚在一起，为了国家的 GDP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只是常常不被看见。当然也不能完全类比，我们也找出了不同的地方，比如，我们很多姐妹多是被迫做了这样的选择，不像花木兰那样积极主动；花木兰很自信，有很强大的自我，我们的姐妹很多人没有“自我”，那个小小的“自我”常常被忽略，连自己都看不见；花木兰的贡献被看见，被传颂，流动姐妹的劳动却常常不被看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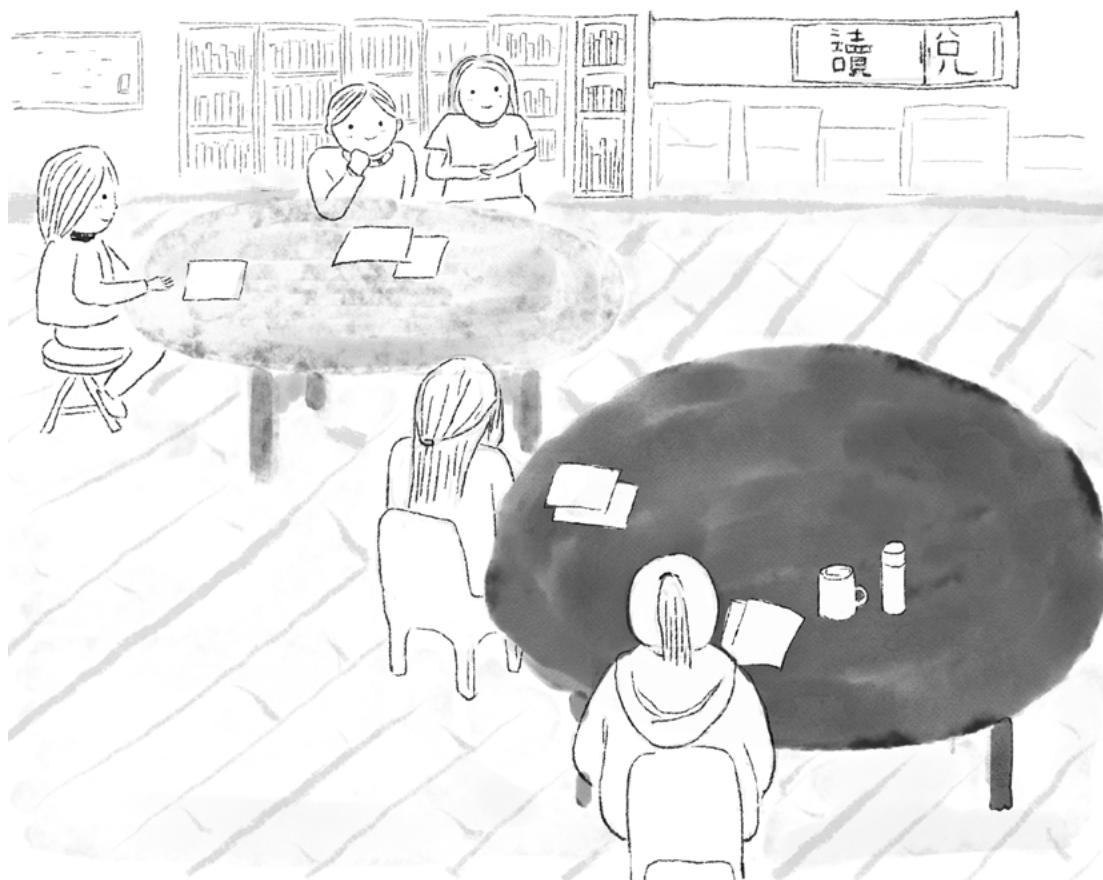
我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众多的流动姐妹是非常相似的，可以说我既是其中的一员，又是典型的代表。我生长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所幸父母重男轻女思想不是特别严重，就有幸多读了几年书，没有像同龄的女娃那样早早地嫁人生子。有机会离开农村，走到更广阔更精彩的世界中去，让我的人生变得厚重：当过老师，做过小生意，南下寻梦的几年，青春在工厂的流水线上疾飞。

在工厂流水线做普通工人的时候，我感觉到生命是那么的黑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用青春、汗水、健康、骨肉分离换来薄薄的几张钞票，仅够维持生计，连生病都生不起。长长的流水线上，充满着流动女工的血泪和绝望，困住了一个一个青春少女。我自己是一名曾留守而现在处于流动状态的妇女。同样我的女儿也有过留守和流动的经历。我们都将各自的伤痛埋在心底，几乎从来不正面谈起。在她留守的日子里，每次看到一家人走在一起，我的眼光会跟着人家走很远；当年，每次听到看到有像女儿大小的孩子哭泣，我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因为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和个人的生命历程，其他的姐妹也有相差不太大的背景，所以“木兰花开”从诞生之初，它的定位，它的价值观，就有其内生的基因，诸如以人为本、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争取外部平等、推动性别平等、践行内部平等民主、看见每个人、以优势视角发挥每个人的力量等。

就像一棵小草一样，我们在很贫瘠的土壤中发芽。我们最初选定的社区在北京五环外，临近五号线终点站的东三旗，对面不到一公里就是号称“亚洲最大社区”的天通苑。东三旗是一个外来人口聚集很密的城边村，据说当时人口约3万人。在村东南有一大片区域，是废品收购站，很集中的一片地上以“家庭”为主的一个个收购站，搭着简易的棚屋，人们就生活在废品和垃圾之中。这片土地的上空，经常弥漫着不同的味道和烟雾。人们就在这里生活工作，孩子们就在废品堆中淘宝、玩耍、长大。我们的活动室就设立在这片收购废品区域的边缘，在一个小二层楼的楼上，二房东是做饭店的。这二楼由一个30平方米左右的大厅和两个10平方米左右的包间组成。我们就选了其中一个包间做办公室，另外一个包间做集体宿舍，经常四五个人挤在那个房间里，连转身都不方便。厕所在500米外的废品收购站区域内，上厕所之困难竟成了那一阶段考验我们和前来做志愿者的学生的一大挑战——能顺利上厕所，才有可能留下来。

我们最初的想法，就是要为基层流动女性做些事情，我们找到了大家居住的地方，也做了调研，了解了大家的基本状况。那我们就要和她们在一起，来看看我们做些什么事情能满足大家的需求。成立之初的那段日子异常艰辛。刚刚半年，机构就面临着生存挑战，没有任何资助了。我们是各奔前程，还是继续坚持？经过一个会议讨论，最后几位伙伴不约而同做出了决定：留下来，一起面对挑战。用春芬的话就是“只要有馒头吃，我们就要做下去”！之后我们就开始了长达一年左右的吃“馒头大餐”，睡“贵宾桌”（把桌子拼起来当床）、“贵宾地”（打地铺）的日子。当时大家愿意坚持下来，是因为我们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认为我们所选择的是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事情，和跟我们情况差不多的姐妹在一起，我们不仅仅满足了她们的某些需求，我们也得到了滋养，这个过程是相互的。跟我们在一起的姐妹和孩子，已经和我们建立了很深的信任关系，有什么困难会和我们一起讨论，甚至把特别难堪的困境讲述出来，我们一起抱头痛哭。



我们在几乎没有任何支持的情况下，继续做我们认定的事情。这些事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社区姐妹精神文化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成立文艺队，唱自己的歌，跳自己的舞，这些歌舞的内容都和大家的生活经历息息相关。很多姐妹们听了我们的歌，好像找到了另外一个自己，加入了我们就有了归宿感，好像在北京有一个“娘家”。另外一类事情就是社区姐妹最关心的孩子教育问题，我们组织志愿者，做四点半课堂、一对一成长陪伴等，让孩子们得到支持和陪伴，间接地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区姐妹的压力。另外就是维持机构运作的二手物品义卖，大家捐赠过来的物资，以衣物为主，我们在社区里进行义卖，倡导绿色消费，减少物资的浪费，也减轻了大家的经济负担，同时支持我们继续向前。我们真的就像一棵野生土长的小草，有点水就能活，给点阳光就灿烂。凭着对我们所做事物的认同，我们坚持度过了最困难的时候，甚至慢慢地越来越有起色。

2015年的时候，机构陷入了一个瓶颈期。有内部问题，大家前期投入太多，没有上下班概念，经常没有时间休息，做的事情越来越多，好像永远有做不完的工作，但是又看不到工作成效。我们慢慢地感觉到了迷茫，找不到前行的方向。外部也充斥着各种对公益的论述。最刺激我们的就是所谓“老小树”，意思是机构成立了好几年还发展不起来。对号入座，我感觉“木兰”就像是一棵长不大的树，甚至还不能说长成了树，我们还是一棵在艰难生长的小草。随时一个危机，就可能让这棵小草活不下去。

那段时间我特别焦虑，经常失眠上火，见人的时候，常常满嘴火泡儿，一个正在长起，另外一个刚刚结痂，被凛冽的北风一吹，一张嘴就裂开，血就渗出。自己又强撑着，不肯也不知向谁说，偶遇朋友关心问候，就会突然红了眼眶，不敢和人对视，不敢把脆弱的一面给人看见。当时的我在个人生活中也像陷在泥沼里的女人，困在婚姻中找不到自我；有过丧偶式育儿的苦闷，苦苦挣扎着寻找爱和出路。我努力思考我的人生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尝试用各种方式去改变自己，改善夫妻关系……在苦闷中挣扎，深深地陷入了自我否定，一点也找不到自己的成就感和长处，甚至觉得活着的自己像是行尸走肉，没有任何价值。那段时间，是我人生至暗的阶段，像是永远都走在漫长的无光隧道里，时间像是永远都处于黎明前的黑暗。

个人层面，好在有众多朋友以各种方式陪伴着我，有长长的电话，有相拥而泣的共情，有持续不断的支持，有……最终，经历了一番艰难的历程，我结束了近20年的婚姻。自由需要争取，也是需要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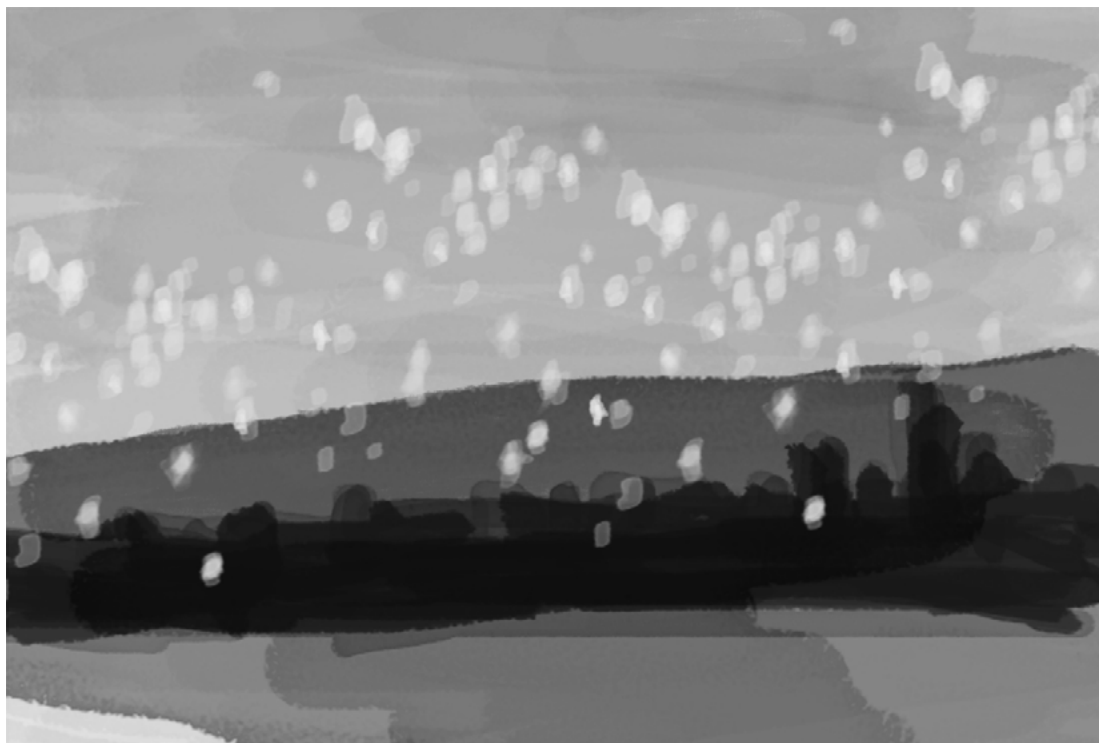
应的，只能慢慢地从泥泞中拔出腿来，一步一步向前迈。最终我发现，一个人的日子也可以充满快乐、自主、自由！

机构层面，与社区伙伴及其他合作方建立起新的合作，像是给我们打了一支强心剂。我们看到每个个体的力量，也看到每个组织的不同。我们就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陪伴着我们社区姐妹。当把心态放慢下来，人就不再那么浮躁，反而有可能给到社区的姐妹们更多的支持和看到更多可能性。接着，我们在机构的工作上也做了调整，放弃大而全机构的预期，根据现实的条件和人手做了一定程度的精简。比如，我们停止了社区二手店的运营，也减少了一部分儿童活动。我们找回自己的初心，把深度陪伴、促进姐妹成长和发声作为我们工作的核心。我们同事慢慢认可木兰的“小而美”，我虽然不能认同，但也不再自我对号入座“老小树”的评判，甚至觉得我们本身就是一棵倔强野草，自有草生存的价值。我们不是参天大树，那就好好地做一棵“春风吹又生”的野草吧！

我们就这样彼此扶持着，慢慢前行。我们团队陪伴社区姐妹，也在陪伴彼此中互相汲取力量，一起面对生活和工作的挑战，改变自己也能改变他人。这些年，我们的姐妹因为家庭原因或外部压力，有的离开了北京回到家乡，有的去了别的城市，还有一些留在社区，继续跟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慢慢接纳了这种“流动”状态，因为“在一起”，并不以物理空间为限定。

姐妹们的成长最初以关注孩子为主，在我们的引导和陪伴下，也开始关注自我的发展。我们以发生在自己身上真实的事情，在外部的支持下排演了一部《生育纪事》来讲述基层女性的生育困境，让姐妹们经历过的苦难与艰辛可以表达和被看到，甚至让这个话题被公共关注和讨论。通过讲述，也让我们姐妹们有机会得到疗愈。此外，我们也成立了自己的手作坊，妈妈们发挥自己的特长，一起做手工牛轧糖、雪花酥等，用我们的双手去创造不一样的生活，相信劳动对于生活的价值。手作坊虽然只是一个小的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是这里的劳动者和管理者，这是属于我们的空间。记得刚开始时，姐妹们不习惯开会讨论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当我们慢慢推动，尊重每个人的意见和想法之后，大家也慢慢地愿意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个过程其实既是赋权赋能的过程，也是每个人成长的过程。在这里，每个姐妹都有了成长的机会，不再是工具异化的人，而是身心与精神都独立且完整的个体。

木兰从不知道能存活多久，到不知不觉中走过了 10 年，我们以



自己的步调，走我们自己的路。回望来时路，有感慨有泪滴，是经历也是沉淀。我们熬过了疫情，进入到了后疫情时期，依然面临着许多挑战和质疑。但是我们团队的整体心态从容了很多，仿佛人和机构都到了一个成年期，不再那么惧怕变化和未知。即使面对压力，也心知肚明无可逃避，只能面对，所以倒也坦然了许多。我们不再怕机构“死亡”，选择向死而生，就能从容地做更多想做的事情。

做公益的十几年里，有挫折，有困顿，至今依然踌躇前行。今年是我的本命年，也是木兰的本命年，木兰12岁了，我48岁了。回望这有晴有雨的48载，感谢生命，也感谢相遇的每一个人。路漫漫其修远，前路仍有浓雾有坎坷……看清生活的真相，还依然热爱生活是一种勇气。我选择活在当下，无愧当下，尽心尽力做好每件事，努力工作，认真生活。木兰选择向死而生，努力活成一种绽放的姿态，是小草也好，是野花也罢。我们不追求高大上，就认真平凡地做我们能做的事情，和我们社区姐妹一路同行，一起面对未来的坎坷路途与更多的不确定。

■ 木兰 北京木兰花开社工服务中心创始人之一、总干事。

很显然，2011年3月11日侵袭日本的东北大震灾与福岛核电站爆炸事故，是促使日本人从各个角度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审视的重要契机。在那之前，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发现，如果社会不做出改变，那么地球绝对不可能持续发展，与此相应人类也无法持续，因而想要发动社会变革，并且采取了行动。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上述事件使我清楚地认识到，之前我们并没有认真努力，或者说我们的行动还不够充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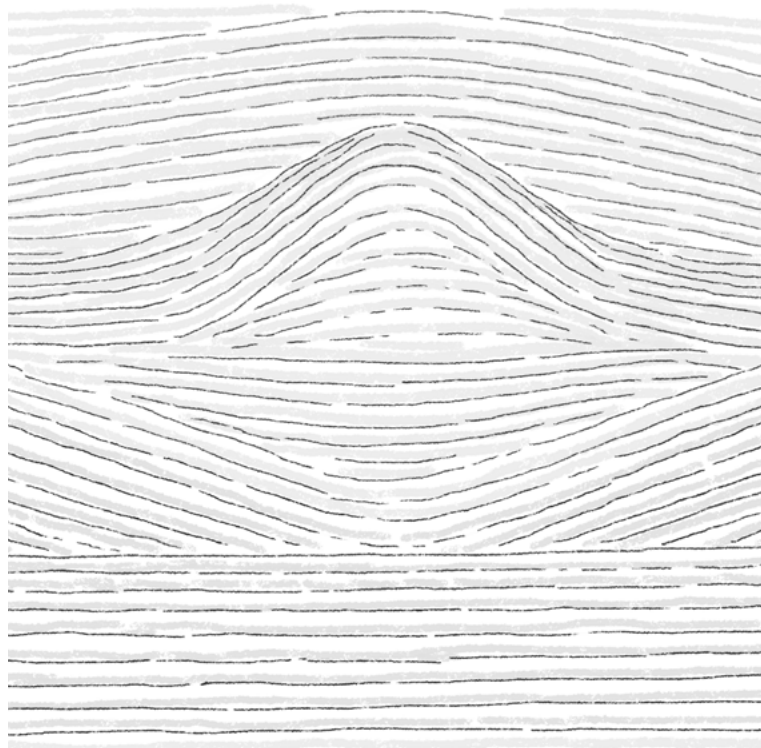
我们随意挥霍电力，不去弄清楚电是用什么方式生产出来的；优先选择便利的生活（而不考虑其对环境的影响），网络上订购的商品很快就送到家中；而我们使用的化石燃料也是有限的资源……我们对这样的系统不抱任何疑问地生活着。

灾难之后，我迁居到东京以外自然环境丰富的地方，改变生活方式，开始一天一天用双手创造自己的生活。具体来说，就是自己吃的食材自己种植；自己用的能源自己生产；自己居住的房子也和木匠师傅一起建造。

我眼中的「韧性」

文一 吉田俊郎

翻译 殷毅



我开始以与自己小小的身量相符的尺度生活。

可是，“仅凭这样远远不够，根本不可能成为可持续的社会”——这个想法充斥着我的脑海。我认为为了地球和人类社会能够生存下去，为了自己未来的孩子们今后能足以幸福地生活，我们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这些事情可以大略分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践行尽量不给自然增添负担的生活方式，同时让大家看到，这种生活并不需要勉强忍耐，而是能够快快乐乐过下去的，是可能实现的。

另一方面，不单单是靠自己一个人努力，要与在同一地区的人们或抱有相同想法的人们共同努力、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一起成长。

我还认为，在迎接大转变时代到来之际，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韧性”这个词，从意象上来说，有弹簧垫的感觉。当某种巨大的力量从外部施加而来，它像弹簧垫一样，作为缓冲材料来缓和压力，能起到减少冲击的作用。它是社区这样的地区团体在发生大问题时，大家聚集起来相互帮助、互相出谋划策，渡过危机的一种印象。

“韧性”为什么会产生呢？在写这篇文章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在我的脑海里闪现出来。在自然界中，生态系统为了存续下去，一定是万物各司其职，相互补充，其整体就是恢复的力量吧。与此相仿，在人类世界，当发生严重问题时，人们也会将彼此的技能、智慧、爱凝聚在一起，成为从头再来的力量。

我们要将大家各自拥有的技能、智慧、爱放在一起进行作业，不过这些技能、智慧和爱如果不在日常就进行磨练，那在发生问题的时候也有可能发挥不出来。所以，我们平时就有提高个人生存技能、智慧的必要。

可现代社会丢弃了这件事，而把时间和注意力集中在了赚钱上。

在转型运动中，社区正在培育这些技能、智慧以及深刻的洞察力和爱，从而提高“韧性”。也许正因为如此，我有了将一生倾注

在这个运动中的想法。

可能这就是转型的魅力。

先来简单说明一下日本的转型运动。

转型城镇在日本始于 2008 年，事情开始的契机缘于原来和我一起
学习过朴门永续的伙伴之一——曾经住在英国苏格兰生态家园芬
德霍恩（Findhorn）的榎本英刚先生，他邀请我和另两个同期同学
一起去听在芬德霍恩倡导该运动的罗布·霍普金斯（Rob Hopkins）
先生的演讲。

具体行动是从榎本先生归国后居住的藤野和我的居住地——同
属神奈川县的葉山，以及东京郊外的小金井这三个地方开始的。

与此同时，我们创立了以在日本普及转型运动为目的的“NPO
法人 转型城镇·日本”。眨眼之间，转型运动在日本广泛传播，目前
约有 70 个地方在进行活动。

其中尤为活跃的，在世界多个国家都为人所知的藤野，是华德
福学园和日本朴门永续中心的所在地，那是一个具备华德福和朴门
永续理念且将之付诸实践的人们居住的地区。

我将把这个地区的情况作为“韧性”得到提高的案例来进行介绍。

包括榎本先生在内的核心成员们着手转型城镇藤野的建设没过
多久，以能源自给自足为目的的“藤野电力”与社区货币——“萬屋”
就开始运营了。“萬屋”是有 350 个家庭、大约 500 人参加的账本
式社区货币。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相互帮助，以这个服务来进行交
换，并按商定的金额，以与法定货币“円”完全没有关系的“萬”
为单位，在账本上进行登记。提供服务方是正数，接受服务方是负数。

这是一个即便是负数也能继续使用的系统。大家并不觉得负数
的人不好，而是认为负数的人激发出了本地区擅长的事情，对地区
做出了贡献——“萬屋”以这样的思维方式进行运营。

加入这个社区货币的条件只有一个——必须听取这个系统以何

为重，以及该社区货币是以相互帮助为志愿和目标的说明，否则不能入会。

入会后，人们首先要把看起来能够为地区做出贡献的事（自己能做的、拿手的事情），和希望别人为自己做的事写下来进行提交。大家可以在网络上看到会员各自能做的事、需要别人做的事的清单。

根据运营规则，交换通常利用邮件组来进行，通过向邮件组报告投入服务的人最终是什么样，可以让社区成员了解到相关情况。

社区成员中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交换，我来举几个例子。

一种是，“没有去车站的公共汽车，是否有人在这个时间去车站？请送我到车站”之类；

其次，“我有个不用了的不锈钢锅，有没有人要用？”像这样的交换也频繁进行着；

第三，“我家门口有个很大的蜂巢，有没有人能帮忙清除掉？”这种情况的结果是附近会赶蜂的人去帮忙把蜂巢清理掉了。

能够切切实实地感受到，由社区货币而产生联结、进行相互交换的社区，已经具有了相当的“韧性”。有的地区拥有十年，还有的地区拥有着二十年以上使用这个系统的实际成果。

再举一个转型运动对提高“韧性”有帮助的例子。

转型运动的特征三个 H（Head, Heart, Hands），重视头脑与心灵、身体的平衡。脑处理信息、进行思考；心是指内心；身是指实际具体地使用身体创造事物。

心的转型对于提高“韧性”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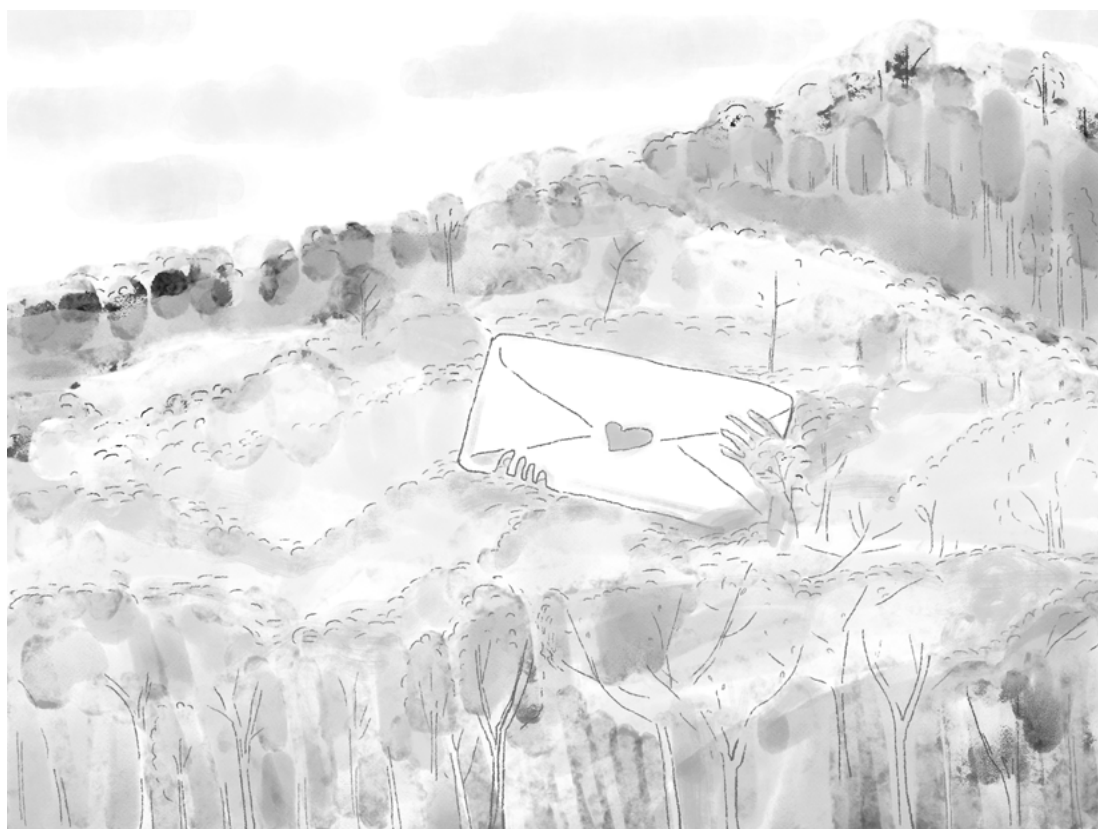
具体来说，在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先请所有人用简短的话说说现在自己（内心、环境等）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通过了解同伴现在的状态和心情，从而能够相互支持，这是我们的目的。

除此之外，会议不仅仅是为了做什么事而举行的行动会议（“Doing meeting”），还会召开存在会议（“Being meeting”自

己真实的样子、存在），这是我们可以通过关怀彼此的内心来预防燃尽症候群为目的，一直做到现在的事情。我觉得它是转型运动能够至今为止长期持续的重要原因。

有人说在社会中为了生存要竭尽全力，但我觉得他们也许是为了生存而竭尽全力赚钱的幻想囚禁了。为了生存而赚钱是他们的第一目的，赚钱这件事不知不觉成了目标。拼命活着，却忽略了享受生活，是非常悲哀的。生活在带给人们这样认知的现代社会，多数人都非常痛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寻找从这个轮回（为了生存赚钱，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中解脱出来的道路。

我感觉，“韧性”的要素之一是多样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没有多样的个性和个体，就应对不了巨大的危机和风险。如果大家都是相同的，即便有想法、技术、经验，也扩展不出更多的可能性，无法与出现的问题相抗衡。多样性不就是生命所拥有的，活下去的本能吗？因为有多多样性，所以能够处理各种问题。如果是



单一状态的话，那就一损俱损了。所以我认为，如果一个社会不重视多样性，那它就是不堪一击的，绝对谈不上有“韧性”。

在日本，由于 2011 年东北大震灾的经历以及近几年的新冠病毒疫情，想要大幅度改变生活方式的人明显增加了。辞掉都市的工作，移居到乡村的人越来越多。

举一个与“韧性”相关的例子。从 2011 年的东北大震灾逃离出来移居到九州阿苏地区的人们，在五年后的 2016 年被烈度 6 级的熊本地震袭击，本地居民有的房子倒了，有的屋顶塌了，之后的大雨又把泥沙冲进屋内。那时，移居过来的伙伴们没有去避难，而是帮本地居民搬运泥沙、收拾房屋、收集食材等，一直进行着志愿者活动。他们自己也受灾了，但是曾经战胜了巨大困难的他们在为帮助其他受困的人而行动。

人类真的是太坚强了，太好了，我深深感到钦佩。

在日本，由于气候变化和人类的过度开发，因集中性暴雨引起的泥石流灾害和大型台风等造成的受灾情况近年来越来越严重。

在这样的状况下，地区的人与人之间相互联系，互相信赖，共同致力于地区的课题，相互帮助，生活下去。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必要的，提高地区“韧性”的关键所在。

文 | Kijtiwachakul Dhammanond

翻译 | 缪睫

校阅 | 陈宇辉

顾晓峰

贾丽杰

危机中的慈悲螺旋之舞



自新冠肺炎爆发，我的生活，包括应对诸多变化，为我带来了许多深刻的思考和影响。我一直渴望和 PCD 网络的好友分享我的想法，但整理成章还是花了好一阵子。

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一直对自己、对其他人以及事情的发展保持充分的觉察。有些宗教人士说我们可与外界切断联系，但我正在学习既进入集体中去共苦，又可抽身稍事休憩。就如同一个顽皮的孩子，享受在雨中的泥淖里嬉闹上几小时，然后回家擦拭干净，重新暖和起来。这本是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一幅图景，如今在世界上的大多数地方却不复再。这也跟人类灵魂深处的恐惧有关。我们自身的错觉和无知也造就了世界如此。对平民百姓而言，拨开重重雾霾去理解这多重关系下的状况，实为艰难。

这现象让我想起了米切尔·恩德的著作《毛毛》。故事中，有一群人鼓动大家把时间存进银行，以换成金钱。从此，大家再没有时间去关心和倾听他人了，除了一个叫毛毛的女孩。现实中也类似，某种力量好像正利用我们内心深处的恐惧、贪婪和错觉控制着我们。在我看来，我们似乎被推入一个毫无选择的境地。例如，人们

觉得诸多药物、疫苗和昂贵设施的发明，才足以带来免于感染新冠肺炎的安全感。我却在思忖别的，比如可以如何提高自身免疫力？如何从整全健康的维度来面对疫情，并且能持久见效？

许多人把自己的安全拱手交付政府、公共健康部门和科学家来守护，而非依靠自己的力量。你是否想过，诸如新冠肺炎等疫情为什么会爆发？你是否想过，你对资源的利用会如何影响环境和其他生命？你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大量垃圾何去何从？这种不当的管理会带来什么影响？如果我们意识到现在面临的一切是所有人共同行为的结果，我相信我们对当下的情况会有更多的觉察、接纳，以及意识到自身所负的责任。我们集体对地球和环境的所作所为，现正反身影响着我们。

虽然我意识到集体的命运，但也相信作为个体，我也有选择并创造自己命运的自由。我相信自己不止可以净化身体，还可以净化我的能量/生命体，同时在我周围创造出干净的空间。我和朋友一起做冥想和心灵练习，以拓展安全、干净的环境空间。因此，我相信即使形势严峻，却不等于所有人都难逃一劫。那些有着强大意志和精神的人将能找到出路，并引领他人脱离苦难。

我开始回归简单的生活。我的房子周围有一个小园圃，在离家两小时车程的地方还有一片稻田。我感到很富足，不只是因为过去几年里能自给自足，还因为我有能力为一些社区提供稻米和食物。在第三波新冠疫情期间，我召集朋友们发起了“危机中的慈悲行动”（Compassionate Actions in Crisis，简称CAC）。作为一名“生命传记”咨询师（Biography Consultant），过去我面向个体和团体开展工作，陪伴他们回顾自己的人生旅程，支持他们寻找自己的使命。我在社交媒体上召唤志同道合、想要加入CAC的伙伴，当时吸引了约二十个人，其中有一半成了活跃成员。CAC为穷困社区提供紧急援助，比如食物、草药和医疗用品。

此外，我们发展出了清晰的使命，即帮助社区发展自我觉察意识、加强心灵层面的免疫力，推广有时被称为“辅助护理”（Complementary Care）的整全健康护理。CAC发现，很多感染者无法去医院就医，只能接受在家隔离治疗，由公共健康部门让医生基于病人的症状进行远程电话指导。CAC认识到，上述的治疗系统有所欠缺。首先，患者的恐惧和焦虑是弱化他们的免疫系统、让他们难以痊愈的原因之一。于是，CAC通过录制视频与视频通话，在线教导社区志愿者及患者运用呼吸练习和外用草药（如背敷

姜片）、泡脚等方式来应对恐惧和焦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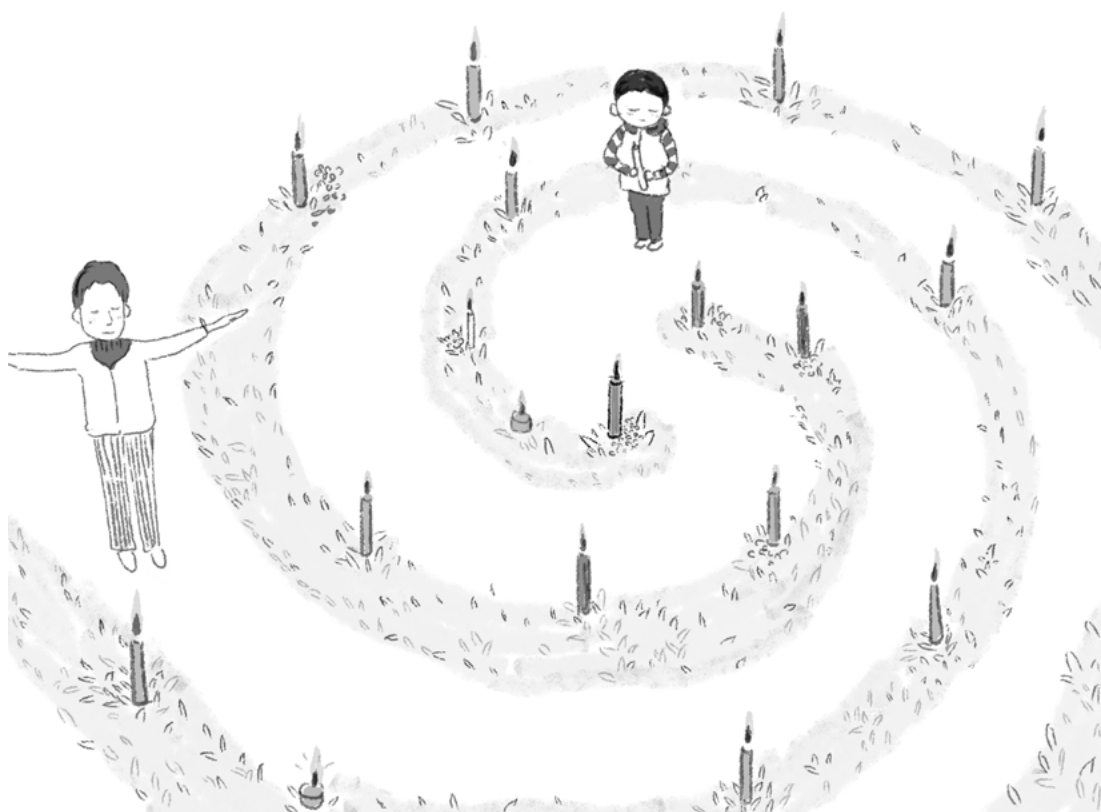
我们将曾深入交谈过也对辅助护理感兴趣的社区与有资质的草药供应商对接起来。在有共享厨房的区域，我们设法提供新鲜的草药，同时把干制草药提供给在家隔离及分散居住的人群。现在情况有所改善，社区领袖也请缨要传播这样的经验。虽然我们对社区的直接支持很快就结束了，但辅助护理的理念和经验仍会发展，一方面在某些社区继续探索，另一方面也会在更大的公众层面传播。

总而言之，我们在这次危机中抓住了为社区服务、培育社区的机会。两个月不到的时间，我们筹措了近一百万泰币（折合约21万人民币）的资金，惠及约三十个泰国社区。我无意夸耀，只是想说很多东西似乎从无形的富足之源流向我，再通过我流向真正需要的地方。通过感知那引领我的声音，我顺着其节奏去工作，又在与人互动过程中经验了彼此的内在成长。同时，我决意在行动前先澄清自己的思绪和动机，掂量内在的感应和外部环境，以及确保我的行为不会产生负面影响。

在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我尤其清楚地看见，自己的状态有如华德福学校的冬季仪式之一：在“深冬花园”里走螺旋——走进螺旋中心并点上一根蜡烛，然后走出去，把点燃的蜡烛放在螺旋小径上。我向内走进自己，向外与世界相遇。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安在当下我获得内在的力量；不管是来自可见的还是不可见的存在的呼唤，我都欣然接纳与拥抱它们。而我的内心似乎也被点燃了，当我向外走的时候，我可以呈现偏见更少和灵魂更美的自己。

上述的体会，可以用在家隔离政策宣布之前的一个例子来阐述。那时我刚结束在印度一个月的能量治疗学习回到曼谷。幸运的是，我回来后能以远程治疗维持生计，而学会了烹饪也使我对生活和所有生命更加敏锐。接着我挑战自己，通过艺术和按摩疗法为七个人（五名儿童和两名成人）进行疗愈。过程中我以爱和关怀与他们接触，让我与更高的精神相连。在一呼一吸中，我体会自己是传送疗愈和保护能量的通道。

在与人们（主要是案主）相遇时，我将自己锚定在以下的信念中——人类内心的能力在净化之途上的作用。我静观新闻中的负面能量和社会中的恐惧在自己内心和思想中引起的反应。我的心并没有因病毒而动摇，却为受苦难的人而颤抖，尤其是那些因失去至亲而悲痛的人。



在第三波新冠肺炎流行期间，我在电视新闻上看到泰国喜剧演员阿尔科姆（Arkorn Preedakul，更为人们熟知的名字是 Khom ChuanChuan）在 2021 年 4 月中旬感染新冠病毒。新闻片段中他被抬进一辆面包车，但他的亲人却无法触碰到他。亲眼目睹永别的场面让我非常痛苦。他的家人竟然没有机会拥抱他、表达他们的爱。这次分离，残酷而孤独。

我深感悲痛，想为阿尔科姆、他的家人和其他处于悲痛中的人做点什么。我前往我正念导师的静修处，希望对包括新冠病毒在内的所有生命表示怜悯。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我能理解疫情是生命演化和能量扰动的一部分，如前文提到是人类行为的结果，但我仍为疫情带来的失去与分离而悲伤。在静修中，我为世间承受的苦难痛哭流涕。有时候，我觉得好像从空中俯视大地，看到饱受苦难的人们却无能为力。20 天后，我感到我的内心、我的思想、我的觉受都清醒过来了，我充满着信念：我有足够的光亮和温暖来疗愈人们

的灵魂。我离开静修处，再次向外面的世界敞开心扉。阿尔科姆在 63 岁时死于病毒感染，我向他表达了诚挚的爱和感激，告知他其离开给我、也许还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生。

我于此阶段的内在转变也将一些新的面孔带入我的生活。在“生命传记”的工作坊和一对一咨询中，我可以就内在成长分享更深刻的体会。我也更委身于为边缘学校、志愿工作、疗愈支持等方面的人们提供帮助。现在我能做的事情比想象中多得多。举些例子：一些社区领袖有意对外传播他们和 CAC 的合作，分享以辅助护理作为应对危机、加强整全社区关顾的经验；一些社区志愿健康小组也在利用 CAC 的海报进行社区教育工作。这让我意识到，只要时间和地点适宜，又能满足人们的需求，那事情就能流动、扩散开来。

当时机到来，只要我们认真倾听，就能让事情发生并推动改变。我反思到，我的经验会成为我的人生假设。在生活和工作中的与世界相遇，是对这些假设的试炼。我已经用自己的人生经验确切印证了好些假设。比如，我们的内心越强大，越多的挑战就会随之而来，以促进我们的内在成长。另一个假设是，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受苦，就没有人可以幸福。当我们都有意愿为全人类的福祉而努力时，那就意味着我们身处的时空正备受祝福。

见·远——空间设计与生活

第二部分

前言

我们对于自己生活所在的地方与空间，有时候会太过于习以为常，甚至会忽略了其存在，就像我们忽略了每时每刻都在呼吸的空气那样。

对于不少现代人来说，我们生活的空间好像已是命定了的模样。小至居室的间隔设计、小区的布局，大至城市的设计、道路的规划，全都被设计规划好、不容置喙。但想深一层，也许现实有更多的可能性：动手做个小家具，重新布局室内空间，参与社区花园的设计与营造等，都是我们可以参与到空间设计的入口。如果这过程能更好地向大自然学习，并和社区社群的朋友共同参与，那我们的生活或许会有很不一样的改变与提升。

这一期的见远以“空间设计与生活”为题，邀请多位朋友与我们分享他们在空间设计里的探索与思考。在北京盖娅设计创始人高健的访谈中，我们了解到参与式设计、生态设计等理念如何发展与演变，泰山与他的伙伴如何把相关理念应用在他们的社会企业当中。在另一篇访谈里，田蕾、甘传与郭子怡老师从“在地计划”的探索中，

聊到乡村营造的种种经验，也深刻讨论到村民、设计师与社区工作者在当中的角色与学习。

陈孟凯老师是合朴农学市集的创始人，他的文章为我们分享了一个由老旧钓虾场改造而成的社群活动中心“树合苑”的经验，并展示了朴门永续与社群发展的理念如何透过空间来呈现。杨向若与王慈航走访了珠三角的一个民居，从主人家身上体会到文化与生态视角如何在一般的民房中像神奇的花朵般长起来。最后，原来在建筑事务所工作的阿乐与我们分享，近年他积极参与香港南涌的生态社区建设，并与伙伴们摸索自然物料在建筑上的应用，以及过程中的身心体会。

不管是在草原、山岭还是海边，人类的祖先大部分时间都能从大自然里汲取养分与智慧，营造自己的生活空间。希望未来我们可以有更多有趣的探索，构建出各式各样让我们可以乐在其中的可持续生活空间。

高健（自然名：泰山）是自然之友·盖娅设计工作室的创始人、首席设计师。他在“参与式设计”和环境教育及生态景观方面，均有多年实践经验，尤其热衷于运用参与式设计普及公众生态景观教育。围绕“空间设计与生活”的主题，我们邀请高健分享他与“参与式生态设计”结缘的故事，不同设计思潮的演变，以及如何把生态设计和公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从而让更多人参与到关照环境的行动中来。

冥冥之中找到方向

你毕业后便在设计院当景观设计师，后来是怎样走上生态营造之路的？

当生态营造师之前我在一间有艺术背景的设计院工作，它比较在意一些图形化的设计，讲究艺术构图，形态好不好看，曲线美不美，但忽略了科学和生态的面向。做了一段时间后，因为社会、环境问题频频发生，加上我在北大学习，接触了一些生态设计的理念，认为不应该再这样做设计了。

2011年我辞掉了设计院的工作，去寻找自己的路和使命。当时我参与了不少自然体验教育活动，像自然体验师培训、无痕山林（Leave No Trace）、地球守护者（Earth Keeper）、绿希望行动等，参与过程中童年的记忆就回来了。用我创作的两首诗来总结就是：

“微微春风放风筝，夏日炎炎捕知了，秋收麦忙斗蚰蚩，寒冬腊月打雪仗”，“邻里互助盖瓦房，儿童上学结成帮，村庄自筹闹元宵，老人锣鼓都在行”。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生活，在“自然的游乐场”里长大，邻里小区互帮互助。这些体验式的自然教育活动让我重新体验到大自然的美好，找回了心中对自然的热爱，还有以前村庄里简单纯朴的邻里关系。

在那三年里（2011-2013年），我也把时间投入到志愿服务里。当时我已加入了自然之友当志愿者，知道有伙伴申请了替打工子弟建设绿色校园的项目（后称绿校园计划），那里全是厂房、平房，环境不太好，我就想用自己的专业能力为他们做点事。大家都知道在环保组织做事，基本上都是用参与式的方式，有了这些体会后我挺有兴趣带着公众一起营造绿色校园，但我不知道什么是参与式设

空间设计与公众参与

对话——高健
林杰伦
文——林杰伦



计，参考了台湾一些案例便试着组织活动。我运用仅有的一点对“参与式设计”的懵懂理解，参与主持设计了3所打工子弟学校¹的校园环境改造。我们每月举办一次活动，让小朋友画出他们对校园的美好愿望，然后把它整理成一份数据，找资助方申请资金，申请完以后再把它细化成为一个可实施的营造方案，然后带着志愿者和学校的师生一起共建，最后建成一个生机勃勃的结合了菜园和花园的校园面貌。那时候没有这种生态营造付费的行动，更多的是向社会招募志愿者，每次来的人还不同，所以接触到参与式的设计，是一个机缘吧。这段经历成为我后来“参与式设计”职业生涯的启蒙和活课堂。

直到2014年我参与改建北京盖娅生态花园才发现更明确的方向。当时用了两年时间在40平方米的庭院开设了24场设计营造工作坊，招募了600人次志愿者参与，把水泥造的普通院子改成具有环保教育生态理念的低碳花园。这场实验还获得2016年度“福特环保——社区实践奖”，评委说我创造了一种新的社区营造模式，值得推广到更多领域去影响更多的人。我一下子被点醒了，因为我还是对在自然之友做的参与式生态设计比较有兴趣，因此跟自然之友沟通后，成立了现在的盖娅设计工作室，成为自然之友共同体的一部分。

有了这些体验，你对生态设计产生了什么新的理解？

我在北京大学学的景观设计专业，它讲究一种生态规划，以及协调人地关系。生态设计其实是用一种自然生态观的角度来做设计。大自然里有各种能量（地、水、火、风）的循环和流动，把这些能量和我们场地的功能，还有空间存在的问题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

1. 分别是大兴行知新公民学校（2011年）、朝阳天通苑智泉学校（2012年），以及昌平燕京小天鹅公益学校（2012年-2013年）。

符合自然生态原理的设计，如太阳能的使用、雨水的收集、湿地的保留等等都是生态设计的体现。而我接触环保机构后产生了另一个思路，就是除了自然生态的可持续，还要照顾到人的部分，亦即人文生态，包括人和社群的连结、人的赋能、人的行动能力的构建，以及人如何参与到可持续环境的行动中，然后成为绿色公民行动生态网络的一部分。因此我所理解的生态设计是一种参与式的可持续设计。

设计思潮的碰撞

你提到的参与式设计，以及我们现时较常听到的社区设计，它们有何分别，又是怎样演变过来的？

参与式设计是一种设计方法，它可以应用到不同场景当中，社区设计是其中的一种，另外还有公园设计、居住区设计。参与式设计跟传统的设计方式不同，传统设计是以景观设计或建筑设计的专业视角看一个场地有什么问题，然后进行方案设计。参与式设计则强调使用者的视角，设计师的责任在于用专业的知识去组织和协调在地用户的需求和期待，我们共同商榷去解决场地的设计问题。这是很重要一部分，参与进来才有认同感，以及产生他们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

参与式设计的思潮在二战结束后兴起，20 世纪 60 年代末全球政治经济发生动荡，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放缓。美国是首先出现“公众参与”和“社区设计”概念的国家，一是源于业界内部的反省，二是源于人们对社会机制失调所形成的社会问题比如对种族歧视作出的应对。设计师开始反思，做设计不是只为长官、政府去做。这些先驱引起了更多人去关注个体和社会底层的需求。随后德国和加拿大也关注到公众参与设计。英国在 1969 年首次有建筑师与居民共同设计社区建筑，称为“庇护邻里行动计划”（Shelter Neighbourhood Action Project, SNAP）。日本在上世纪 70 年代末兴起造町运动，就是振兴乡村，建造古街的运动，让整条街上的人一起出来表达，共同参与设计整个过程。

我看到参与式设计思潮的兴起和社会经济发展有关。二战以后美国经济迅猛发展，开始思考人民的问题，人的参与感，人的获得感，之后是英国、日本。日本受美国援助经济发展得特别快，然后也开

始思考人的问题。后来台湾那边的经济发展也很快，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上世纪 90 年代起开始面临居民参与的问题，进而关注到参与式社区营造。

另外一种也跟生态设计有关的思潮——朴门永续设计，可以介绍一下它的特点和演变过程？

朴门永续设计是源自朴门思想，简单来说是如何照顾地球上的生态系统，如何照顾这场地里的人，以及分享资源，形成一种社会、生态、经济三者相融合的生活方式和伦理；朴门设计关注的更多是公众如何在生活层面进行实践。

它是源自 1970 由澳洲的比尔·莫里森（Bill Mollison）及其学生所创立的朴门理念。莫里森长期倡导环保主义，但如何实际行动呢？抗议不一定有效。他是生态学家，有一天他到森林里，注意到脚下踏着厚厚的落叶有机层，扒开一看，里边深深扎着土壤的根系，土壤肥沃，水份充足，然后他看着飘下的树叶，就顿悟了。他开始用自然生态的原理去设计我们的生活和生产。他后来和学生通过研究，巧妙地把跟自然生态有关的学科，比如土壤、植物、动物、能源、水、经济等等整合在一起，使一个社区变得有生产力，这样才是可持续的。朴门一开始是从农业的角度，讲如何让贫瘠的土壤变肥沃。因为它是开放给公众的课程，每次培训有不同背景的人参与，他们提供了一些不同的视角，后来慢慢地就扩展到一些生态的设计，生态的建筑，还有城市的修复、防灾等等。朴门把各行各业觉得可持续的，比较自然、永续、生态、环保的理念和思想都融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翻译成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让公众能够从身边的空间如阳台、边角绿地、房前屋后的空地集结社群去行动。

这些设计思潮对于我们应对国内的环境问题，有什么启示？

我们国家的参与式设计是有一定土壤的，从政策制度上来说我国出台的《城乡规划法》，其中确切地强调了公众有参与城乡规划的权利，但是实施细则和相关制度不详。国家的建设更多是政府、房地产开发在营造人居环境，营造社区，这种建设方式会导致许多与使用者之间的问题。第一，我们都知道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猛。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问题突出且明显，已经形成一种问题共识，即雾霾、水污染、环境、内涝和城市钢筋水泥化等问题受到普遍关注。环境问题单靠政府和企业是不能彻底解决的，需要公众的参与才能达到平衡。第二，我们现在居住的社区，人和

人与人之间关系疏离，演变成一种原子化的社会，这存在着众多问题，比如彼此淡漠，社会的社群联动就会产生问题。人和人之间应该是有交流的，应该符合国家政策倡导的共建共治共享，所以国家的政策如何和人民群众的行动持续连接起来，就需要大量社会力量的协力共商，比如环保组织、研究机构等共同参与进来。同时需要一些进步的人士，先做出一些案例或行动，例如用参与式设计让更多人看到这种可能性，然后有更多人从事这样的职业。

这些思潮对你的实践又有何启发？

给我的启发是一个好的设计既能改善环境，又能满足在地使用者的需求，还能在人和人之间形成一种有力的行动社群，可以持续把营造的环境使用和维护起来，或者形成一股力量去营造更多的地方。朴门设计就好像一个增加人的行动意愿的助燃器。最初的启发是源于2013年我参加朴门永续设计的认证课程，当时老师在讲朴门的原則时，我一下意识到，噢！我原来已经做了类似朴门的事了。朴门设计讲究的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把专业的东西变成公众易懂的，让他们能够在生活里实践。而我当时跟自然之友的伙伴在北京参与的打工子弟校园改造项目，例如把雨水花园翻译成大家看得懂的内容，也是在讲如何把生态的设计和公众日常的生活结合在一起，让更多的人去参与，去行动。我坚定地把专业的生态景观设计、环保组织自下而上的摸索（参与式设计）、朴门永续设计三者融为一体，所以成立了盖娅设计工作室，它实际上也是我对专业界的一种探索。



生态设计的实践

盖娅设计工作室怎样让公众参与生态设计？

盖娅设计推动“参与式”、“可持续”的设计理念，以设计启蒙公众的环境意识，以增强公众参与改善环境的能力为目标。我们的工作分为两个部份，一是做可持续环境设计，另一个面向公众做设计培训，并联合社区、校园、自然教育基地的网络形成社群平台，推动可持续的环境设计。经过探索，我们在社区营造绿色环境，以社区花园为抓手，运用共建共治共享的理念，让居民参与建构社区环境及社群关系。因为公共领域有政策和资金支持，可先从公共领域发挥影响力，从而影响到个人和家庭。

另一个实践场景是在生态校园，很多学校有闲置的绿地可以利用起来，把每一座校园建成可持续低碳的生态校园，让它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自然教育课堂，一个户外教室。我们现在做了将近 20 所生态幼儿园设计实践，让每一个学校的孩子学习堆肥、雨水收集、种植食物、垃圾分类等，在校园中设计自然游乐和教学设施，有助于孩子的身心发展。

工作室开办了 5 个年头，有没有看到一些社区的变化？

有不少。比如在北京某个社区，我们要去做生态花园营造，一开始去的时候，居民对物业管理有些意见，自然不相信我们外来人；我们到现场听到的基本上都是抱怨。常规的参与式设计分组讨论无法进行，我们就让每个人发表意见，然后我在黑板上记录、总结，让大家看看这是不是大家共同面对的问题；问题形成共识后，我们再做设计并将方案汇报给居民。在实际营造的过程当中，对我们怀疑或反对的声音就慢慢消失了，他们看到了我们的真实行动。令我们特别高兴的是，最初的目标达成了。我们的项目结束后，社区居民还不断在花园中做营造行动，包括今天（2021 年 11 月末）刮着大风，社区居民还在打理花园，他们在群里发了好多志愿者参与场景的图片。这是从一开始不太积极的局面转变而来的，从刚开始令人有点沮丧，到后来持续的参与，我体会到我所做的是令人觉得幸福的工作。

■ 林杰伦 社区伙伴城市团队项目官员。

谁筑乡村梦？从仙娘溪村的经验谈起

对话——甘传 郭子怡 田蕾 文——田蕾

2015年，毕业于AA建筑学院（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School of Architecture）的Peter Hasdell和郭子怡两位建筑师启动了“在地计划”，开始与乡村社区合作，通过参与式设计探索可持续发展。在地计划与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合作，先后在四川庙坝村、湖南洞雷村、广东仙娘溪村等社区开展空间建造工作。2017年，在广州从化良口的仙娘溪村，从小舞台到小广场，村民们搜集本地材料、投工投劳，以极低的成本将废弃材料堆积场变为村民开展活动的公共空间。2021年12月，在地计划团队的郭子怡、绿耕的甘传与社区伙伴的田蕾，就仙娘溪的工作经验展开对话。本文主要内容来自此场对话，由田蕾整理和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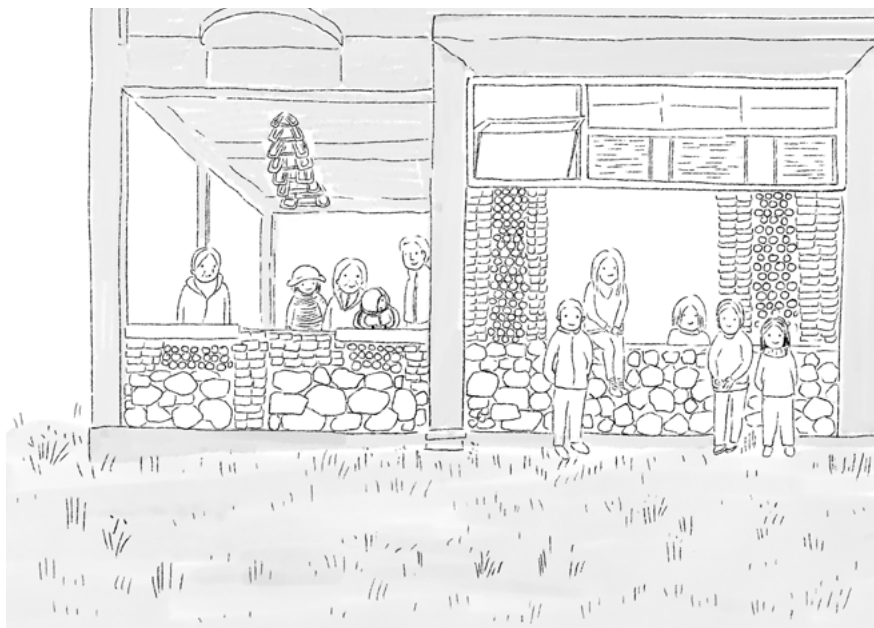
建筑可以怎么做？做什么？

田蕾（下文简称“田”）：之前去仙娘溪，对村子里的小广场印象很深，它不像常见的统一的水泥地面或者地砖铺就的广场，而是由不同样式的小方块组成，很丰富也很漂亮。当时还碰到村民给我指哪块哪块是他铺的，说起来非常有拥有感和自豪感。起初为什么会想做舞台和广场的建设？一般情况下建筑要投入的资金比较多，但好像当时的资金并不充裕。

甘传（下文简称“甘”）：绿耕以前说我们的工作有三板斧，其中三板斧就是建房子，打造公共空间。在仙娘溪，从一开始就有空间改造的工作，比如最初做民宿，改造当地的老房子。但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是看到老房子可能有一些历史文化的价值，希望通过老房子改造，让村民能重新认识传统的建筑。后来还重修了一个祠堂，祠堂代表村里一些姓氏人的共同信仰，恢复后，大家好像重新找回了一种认同感。

当时的理解主要是关注村民生活的空间或者说生活的环境，希望把生活空间变得更好。虚的层面，是希望大家重新认识家乡，以及让大家能够看到过程中的这种合作关系。最后这个建筑具体长成什么样子，我们最初没有太多的想象。

郭子怡（下文简称“郭”）：如果我来解读社工工作，我认为它是用空间去回应社区的需求，营造社区的公共性，组织或培育一些村民去运营，重点不是那个空间，而是他们怎么运行、怎么操作、



怎么合作。到了建社区广场，因为我们更注重过程，所以我们把整个建造过程拆得很长，然后在每个环节尝试融合社区营造的工作。

甘：是的，最初与村民讨论建广场，大家觉得很简单，比如村民拿出块地，社工拿点钱，买一些水泥，我们大家一起来干，直接用水泥硬化就好了。这是村民最直接的想法，但后来我们想是不是可以有更多的想象。

郭老师团队在村里做了材料的调研，发现村里有些烂钢，有很多石头、很多本地的树木，也有很多废弃的瓦缸、石条，他们就会在图纸、模型上把这些材料放进去，让村民看到这些“废品”也是可以用的，有了一些更清晰更具体的想象。村民就开始分工，拉着他们的小斗车，看到哪里有不用的烂砖烂瓦或者烂钢，就去跟主人聊，把这些收回来。后来，村民想象小广场边上是需要有些树的，我们又说不需要去外面买，看本地有没有他们自己觉得特别好看的树，很多村民就说有些树在秋天长叶子，有些在冬天长叶子，有些会结一些红色的果子很漂亮，然后他们就上山去找树了。

那时候，有一个年轻人组成的建筑研究小组，广场所有的石头都是这些年轻人去河边一块块捡回来的。他们几乎把村里的三轮车借了个遍，因为车是要烧油的，但他们不会加油，就靠“厚脸皮”去借。

整个建设的过程男女老少都有参与，而且一个人的行动会影响到其他人。记得当时有一个村民，村里很多人说他比较吝啬，但在建广场的时候需要用桶，他很主动，很愿意把自己的桶借出来，基本上从开工到结束，一直都是用他家的桶。可能因为他觉得这是跟大家都有关系的事情，这种社区的氛围让他愿意贡献。

过程中郭老师还用到了功德碑的方式。当时有做一个登记表，哪户人家，捐了什么材料，投了多少天工，每天都会记录，最后都会上榜。我们发现大家还是挺在乎这个的，最开始大家觉得投工投劳不可能，后来无论是收集材料还是整个建设过程，都是村民投工投劳完成的。

郭：我个人觉得建筑是很有效的进入社区的方式，因为它很大，是个硬件，触及的面很广，而且很实在，通过各种方式影响我们居住的空间。我们以建筑作为一个目标，阿甘他们作为社工去开拓一些关系和交流，巩固一些价值观、一些很重要的关系，一起来营造一种梦想，或者理想生活的状态。刚才说到的功德碑，背后也是在建立一种社区自信、社区归属感、社区的梦想。

甘：大家有了一个梦想之后，自己就会开始不断搅动。通过共同建造，大家开始看到自己的一些能力，重新有了自信，也看到共同去做一件事情的可能性。其次就是搅动了大家对社区更多美好的想象，这种美好的想象里面有“个人生活”的美好想象，但也是包括其他人的，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不仅仅是关于我自己生活的美好想象，也包括村里的其他人，村子的环境、空间。最后，其实还搅动了村民重新“看到”社区，举例说，村民现在觉得的资源，过去可能是没有意识到其用途而觉得是垃圾或废弃物。

比如建社区厨房，是村里的阿姨们提出来的，她们有一个小组在做饭，需要一个空间，于是请郭老师来做了一点设计和讨论。阿姨们是自己投工去建的，有时间就来一起合作干几天，平时大家又干自己的活去了。这么一个小厨房，包工头可能用一个星期就建好了，但她们用了差不多大半年的时间才建起来——慢一点，但有更大的认同感和拥有感。阿姨们也没有把这个空间完全变成自己小组的、私人的厨房，或者只是用来做生意赚钱的地方，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大家聚会的地方，即使没有工资或者很少的劳动报酬，也愿意为老人家做饭的一个社区厨房。

厨房建好后，门口一开始什么都没有，但她们觉得门口应该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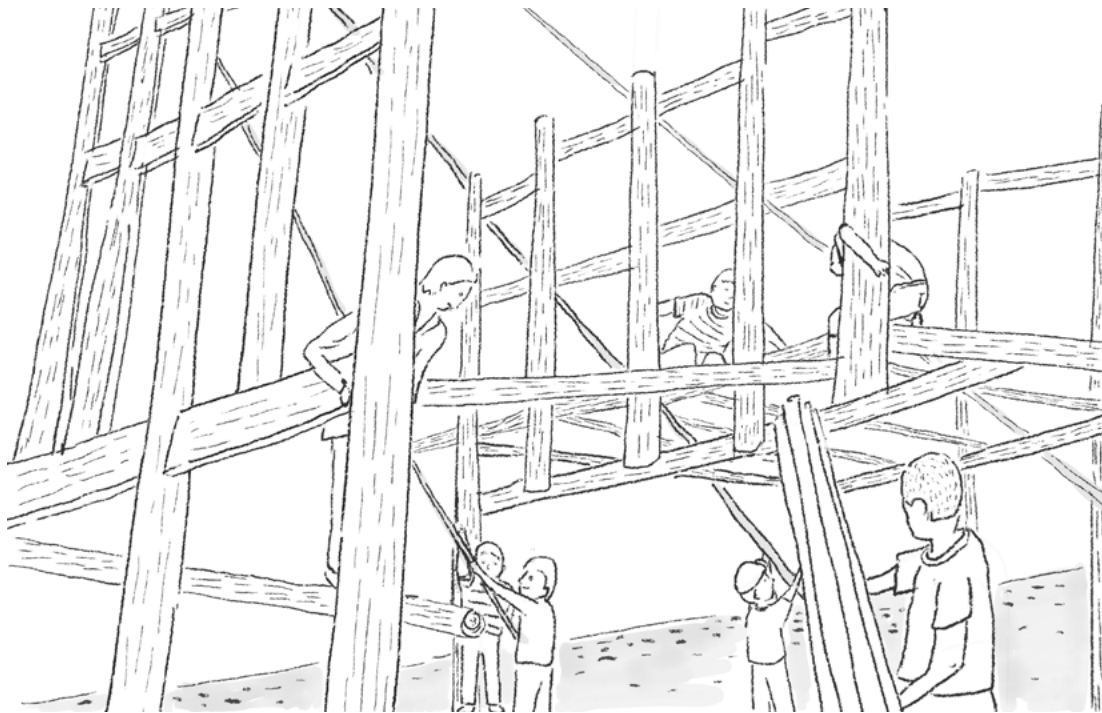
点花花草草，阿姨们并没有说要去外面买，而是从自己家里搬了一些花草放在门口。那几个花坛也是用废弃轮胎做的，广场建完之后，她们知道这些废弃的材料可以重新发挥用途。

田：讲社区厨房的时候，感觉当我们谈“美好想象”不只考虑个人生活，也把别人考虑进去时，人与人会建立一个更稳固的关系，而且带来更多安全感，好像也不需要很多钱去购买材料或社会服务，某种程度上构筑了一种更有韧性的关系和生活方式。

甘：所以我觉得要跳出建筑去看建筑，它不单纯是一种方法或者工具，更是一个媒介或者一个桥梁，带动一些关于价值的讨论，关于我们期待一个什么样的社会的讨论。而且，在这种互为主体的建造过程中，参与的每个人都是有成长的，也相信背后的一些价值。

谁在设计工作中的主体？

田：阿甘提到“互为主体”，平时也常听到郭老师和阿甘提起。看到在仙娘溪的案例里面，村民有很多参与，互为主体是指参与式吗？具体的含义是什么呢？



甘：我觉得进入乡村很重要的一点是，是否愿意带着一种尊重进入乡村。互为主体是说我不是很强的，你也不是很弱的，我们各有所长，这是一个基本的态度或者价值观。比如在仙娘溪，感觉郭老师只是做一些边边角角的工作，大框架是大家一起来定的。郭老师画了一个图，做了个模型给村民看，然后村民根据想象自己去完成它。开始也只是说建广场，村民提出要有舞台，才有了现在这个舞台，然后是社区厨房。你说这些建筑到底是谁的想法？完全是郭老师的想法？不是。完全是村民的想法？好像也不是。大家的东西都融合在了里面，最后也很难说到底是谁建的房子，谁建的广场。

或者说，互为主体是虽然设计师带着某方面很专业的技术，但是也愿意放下自己，给村民空间。村民对一个空间也是有他们的想象的，在广场铺地的时候，村民会根据自己的经验，提出我觉得这样画比较好，应该这样铺等等。在这个过程中，设计师没有说大家一定按我的图纸来，没有很强烈地去引导某个东西就是好的，或者我设计的就是好的，一定按照我的设计来实施。

郭：参与至少是互为主体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且这种参与不只是来参加，而是大家一起来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参与决策。

我们追寻的互为主体，其实是找到一种共同的声音，而不是做事情之前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目标。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像生命一样，每天都要尝试做到互为主体，因为你总会做错事，每天都会做错事，它就变成一个生命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我们团队也会吵架，可是我们要想办法去解决，重点也不是建筑设计，而是我们要一起找到共识，在村子里工作也一样。我觉得这是一个交友的过程，一个探索的过程，一个找到新可能性的过程。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能做成，每次做完我都觉得好奇妙。

田：你们讲互为主体的时候，我经常会有有一种共同创造的感觉，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村民是主体，社区是主体，我不是主体，但是感觉谈互为主体的时候，好像作为一个外来者，我也是这个事情或是社区的主体。作为一个外来者，我可能有建筑的知识、社工的经验，但进入到这个场域里边，我们是平等的，村民愿意接纳我，我们就一起来为社区做点什么，至于能做到什么，就像郭老师说的，有时候是一个奇妙的过程，也不能够先设想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其实是在信任关系里面去完成一个共同的想象，可以这样理解吗？

甘：进入村子的时候，外来者很难排除自己的想象，往往带着自己的价值观、希望做的事情。但你要坦诚地跟村民说，村民也会有自己的盘算，有些村民愿意接纳，愿意跟你们试一试，有些不愿意。可能过一段时间，有的村民也会走，这些都要接受。

互为主体不能回避自己的所求，但这种个人的私，是放在共同关系的寻求之中，这种关系是大家都向往的，它就有了一定的公共属性。

郭：我们讲参与式设计，不是说听听社区的声音怎么去设计，是推动社区共同建立一个目标，然后延续一种氛围。记得有一位老师问星哥（仙娘溪的村民），这群社工、建筑师走了，未来怎么样？星哥说精神会留下来。我也私下问星哥：为什么你们会做这件事？他说：就是想试试我们村民会不会有这样子的能耐，一起去干一件大家的事。所以他们抱着一种尝试的心态，也是一种对自己的挑战和对对自己社区的期望。

我们的社会失去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那么用心地投入到社区，也是因为社区工作中找到了温暖，一种人性的温暖。互为主体是相同的，不是说进村帮什么忙，而是在寻找这种人性的

温暖。为什么我们参与社区工作？说到底是为了我们自己。我觉得我们在寻求一种理想的人性，一种可能性。

设计师追求什么？

田：作为一个设计师，感觉郭老师很少谈建筑是什么样子的，设计理念是什么，常常是在谈人性的温暖、人与人的关系，为什么呢？

郭：可能跟我的教育背景有关，我跟 Peter 都来自英国的 AA 建筑学院，我们的教育背景总是要求我们思考什么是建筑，老师总是在挑战我们所做的建筑和探索是不是真诚，问你这个人可以为这个社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这整个过程是在学做人。可以说，这个教育背景引导我们意识到建筑是一个探索的过程，跟人的价值观有关。后来通过古学斌老师¹认识了像绿耕这样的社工，参与他们的工作，也影响着我们的一些价值观。

田：在这几年农村工作的过程中，想法会有一些变化吗？

郭：作为一个建筑师，总想试一些东西，（将想法）实践出来，是一个很基本的需要。起步时，还是蛮常规的，当初在仙娘溪盖广场，开始的时候画了很多图纸，对设计成什么样子有一定的追求。但对那种所谓的设计或样式的表面追求，慢慢地越来越少了，这也是我的转变过程。

田：你说的这个转变过程，有来自村民的影响吗？

郭：记得第一次到庙坪村，进一个大叔家，他邀请我坐下来吃饭，到处都是烟，厨房油腻腻的。然后我在那边跟他聊天，才明白厨房黑黑的，是烟熏的，而烟熏对房子防虫很有效，他还说这个筷子是他自己做的，墙上挂的一串串辣椒是他自己种的……环绕一个人的全部都是来自他身边的大自然，怎么可能？那是我第一次进入大陆农村工作，前几天我完全被惊到了，因为我来自城市，我的所有东西都是买来的，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做的，在庙坪看到那种来自自然的智慧是很强大的。

这是比较物质的方面，也有精神的。作为在台湾长大的人，对

于乡村我们有一种传统的价值。这样的价值在英国似乎没有，在香港这样的城市也好像找不到。当我们从千里之遥的台湾过来，竟然在四川找到很真诚、好似回到老家的感觉。那种人与人的关系，尊敬你，邀请你来我家，请你吃饭……在大陆农村，我又找到这种很亲切的感觉。

这几年的工作，让我渐渐觉得这群人总有一种很特别的氛围和价值观，是可以让我们追溯自己的根的，所以我越来越不注重建筑长什么样子，有时候做出来的建筑没有很漂亮，但我觉得更真诚。



- 甘传 2013至2018年曾作为绿耕驻仙娘溪村工作员，把农村和行业当作自己的人生田野，从日常生活中找到感动和社区前行的资产与动力。
- 郭子怡 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讲师。毕业于伦敦建筑联盟学院，2015年开始参与乡村社区发展工作，与 Peter Hasdell 联合创办“在地计划 Insitu Project”的建筑实践研究平台，以社会性建筑方式介入社区工作，探索在地性发展理念。
- 田蕾 社区伙伴北京代表处项目主任。

1. 古学斌，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研究与发展网络中心执行主任；中国社会工作硕士课程主任。长期参与并支持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工作。

树合苑的空间设计与生活

文——陈孟凯

2015 年“树合苑”成立了。在合朴农学市集创办人陈孟凯与合朴建筑伙伴孙崇杰的带领下，大家运用朴门（Permaculture）永续生活概念与协力造屋的模式，将原本的钓虾场改建成树合苑。树合苑既是空间也是社群，是生活、共学、创业的基地。

树合苑位于台中市闹区通往高速公路的要道上，面积约 600 平方米，最早是一间木材工厂，四十年前因为市区发展人口密集，工厂搬迁至工业区，后来改建为八米高的商场空间出租。原来的承租户是二十四小时经营的钓虾与电子游艺场，于 2014 年离开。此后，出租者希望将空间租给从事环境友善事业的商业组织，但是此地段租金高昂，找到合适的承租者并非易事。当时合朴农学市集已发展七年，累积了一定的友善食农商业经验与互助社群，值得在市区持续发展，后来决定承租此地，以“友善大地、永续环境”为原则，将旧有空间重新规划打造，把自然引进都市。

把问题视为资源的旧屋绿改造

树合苑原本的建筑空间是有四十年历史的铁皮屋，为了改善室内阴暗且闷热不通风、耗费大量能源提供照明与空调等问题，采用了朴门设计，效仿大自然循环的绿改造模式。将单层圆拱铁皮屋顶从中间剪开，改成双层屋顶的太子楼构造，原理是：透过上层暖空气上升，牵引户外冷空气进入下层，形成自然对流。因为台湾夏天吹西南风为主，所以设计上考量到冷空气主要来自西南边户外大树旁的景观水池，如此的朴门建筑设计，好处是“将室内热与湿排出”，而太子楼空间的庭园宛如温室设施，适合种植各种绿色植物。有了自然阳光、风的流动与绿意植栽，整个树合苑变得更加宽敞而明亮！

树合苑改造的挑战很多，例如地面中央有一个深一米五、面积五十五平方米的钓虾池，阻碍动线也增加施工难度。为了把货柜屋放到适切位置，必须拆开屋顶与支撑铁架，使用吊车把货柜屋从空而降至预定位置。一般做法会把钓虾池填平以减少工程的难度，不过具有朴门设计的“把问题视为正面的资源”（Turn problems into solutions）的精神后，往往有意想不到的创意产生。后来钓虾池变成绿树包围的下沉式多功能空间，沿着咖啡树旁绿意盎然的“树池书坡”，有一种错落高低的空间感。环顾四周，不难发现涂着青绿



色油漆的货柜巧妙地叠置着，搭配序列有致的开窗是空间也是装置艺术，亦是由高处观赏树合苑的好位置。

钓虾场原来的厕所拆除后，下方的化粪池（Septic Tank）也摇身一变成成为正面资源。树合苑的屋顶雨水回收系统需要大雨时的溢流出口，化粪池成为雨水回收系统的滞洪池。台湾是多雨的水资源丰富地区，但如若妥善地截留收集雨水，遇到缺水危机时的可用性就会很高。雨水是天然蒸馏水，理论上很干净，雨水会脏是因为清洗空气与屋顶集雨面（前段水）的关系，所以树合苑的屋顶雨水回收设计，是先将前段水排除，透过屋顶排水系统顺引到贮水桶，搜集“后段水”的蒸馏雨水作为植栽浇灌使用。雨水与阳光透过化粪池上方剪开的屋顶进来，敲除附近水泥地成为室内田园，种植半日照作物例如咖啡、香蕉等。树合苑以实际成功案例，希望能广泛地推广朴门可持续设计原则。

树合苑也打造了都市内不冲水的马桶——生态厕所，兼具省水与制作有机肥功能，其机能与卫生运作原理很简单：如厕后，手动转盘搅拌，搅动大量的木屑、稻草秆等有机物与排泄物混合，吸收排泄物中的水份，减少与空气接触，这样自然不容易产生臭味。排泄物与下方发酵槽中含有菌种的木屑、腐植土充分混合，利用微生

物固态发酵原理，半年后就能变成适合植物所需的有机质与养料！

生态厕所所以传统“穿斗式”木构建筑设计施作，与合朴志工们群力建造，用传统工具凿榫孔、组装，再合力把墙面立起。孙崇杰道明了协力造屋的精神：“早年乡村没有专业建筑师，都是由在地家族或村子里的居民一起动手，因应当地的气候、习惯、取材兴建房子，就会产生不同的地域风格。”台湾的9·21大地震造成农村大量房屋损毁，许多农民没有经费灾后重建，虽然经济力不足，但是可以运用当地自然取材、居民协力造屋、相互合作等方式解决问题，树合苑借由生态厕所协力造屋来传承这珍贵的价值与精神。

带着期许与使命，让废弃钓虾场成为善念聚集的集会所。树合苑像是在都市中实践朴门永续生活的学校，学习善用阳光、空气、水、土等基本元素，从屋顶太子楼到钓虾池的空间安排，做自然有机的空间布局，希望让人有种可持续安身立命的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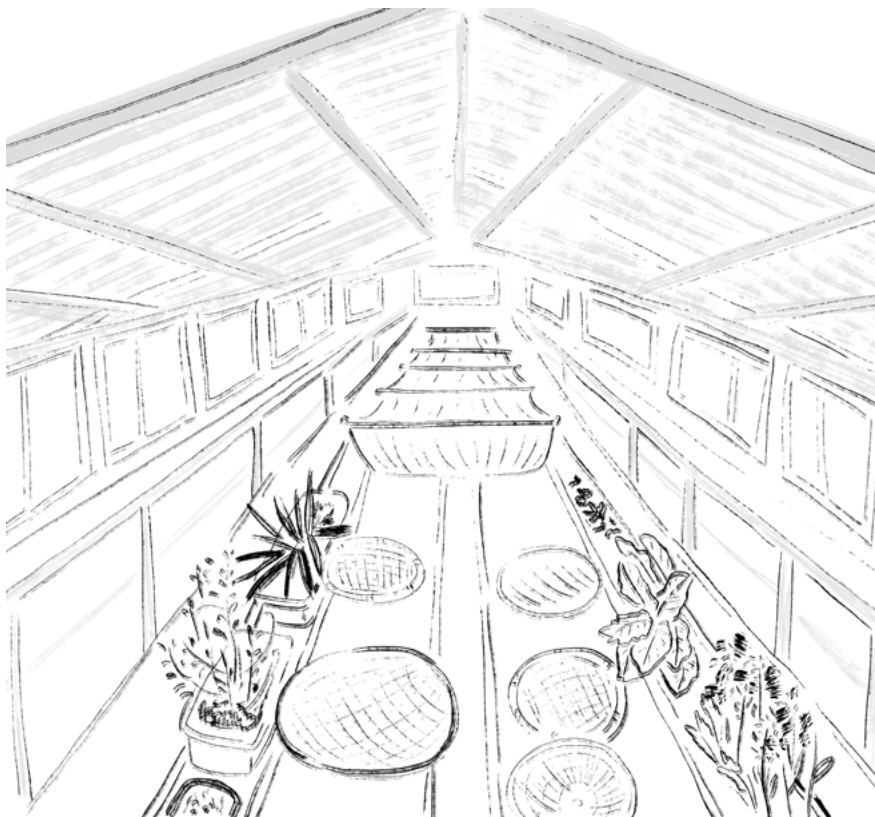
想想，一个旧屋绿改造的空间，一个生产者与消费者相遇的场域，一群有缘人共学共老的梦想基地，该怎么取合适的名字？最后想到了“树合苑”！

树合苑三个字，分别表述了成立的经营理念：“树”寓意着生态、自然环境；“合”有团结、合作、聚集能量的意涵；“苑”则是清新、自在、共好的园地。树合苑的谐音像传统民居“四合院”，亦是期许能成为喧嚣都市中的桃花源。

大家一起参与友善食农“生活”

消费不代表“生活”，美好生活需要“参与”。树合苑是个“参与与生活”的地方，让来到这里的生活者放下手机，学习黄豆加工、手工皂、染布、煮咖啡、泡茶、养鸡、种菜等等，我们一起透过手作与日常的食衣住行，在树合苑重新找回人与土地、自然的关系。

树合苑致力于建立社群共好，成为一个自利益他的友善食农基地。透过“参与”体现自我价值，关心彼此建立互相信任的人际关系，建立对他人有贡献的“共同体”，进而借由共同体的归属感获得人生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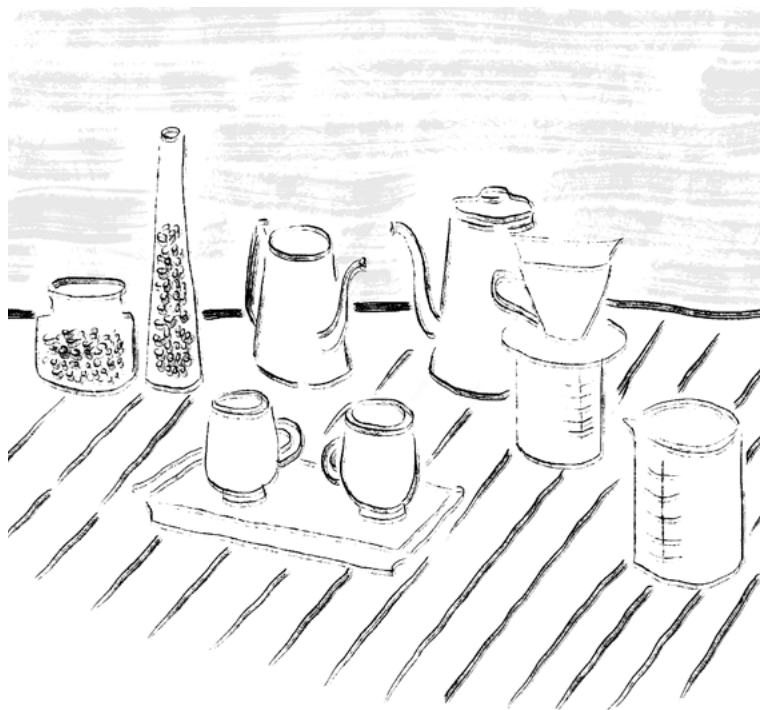


“第二人生”：实践“创生”的幸福园地

树合苑重视“做中学”，经常举办手作课程，邀请有机小农来教消费者制作友善加工的食品和料理，透过手作让消费者更了解有机农业的意义与价值，培养“社群力”的同时，也带动“经济力”。当人们愿意付钱购买安全有机的农产品，才能鼓励更多小农投入有机栽培，生产对土地更友善、对消费者而言也更优质的食材。

经过六年多的摸索与累积，树合苑定位逐渐清晰，即针对“第二人生”群体提供“创生”经济与社会协力的平台。

学员退休后，可以选择在树合苑的第二人生“创生”平台，顺着自己的兴趣与热情，创造幸福“生活”，赋予“生命”意义，够



用“生计”收入的三生平衡。以协杠（Slash）方式投入友善食农产业，亲自动手做农产加工，例如：酿造味噌、盐麴、豆腐乳，或是学习做豆浆、豆花、豆腐，手冲（公平贸易）咖啡等。在树合苑，第二人生学员不是以赚钱为第一考量，而是依着兴趣与热情，学习农产加工，创造可持续（有机）农业的附加价值，让生命更精彩丰富。

“第二人生”优先顺序为健康、心情、关系与财务，可持续农业和“第二人生”两者的价值观很类似。透过手作营养又安全的食物照顾个人“健康”；因循着友善环境、服务他人带来好“心情”；过程中将消费者与小农串联起来，形成互惠的“关系”。虽然第二人生不以赚钱为第一考量，贩售专业手作农产也能得到零用金收入。这收入代表社会认可的价值，以及“老有所用，够用就好”的尊严。

树合苑提供多元的农产加工程度（Programs）。以百酿千农为例，由无思农庄技术指导，培养一“百”位手“酿”师，支持一“千”位友善耕种“农”友。树合苑提供符合食品加工安全法规的“加工厨房”与“酿造室”和毕业学员们共同使用，以“联合酿贩所”合作社经济方式共同销售与推广。其他农产加工程度包含百咖万磅、百染千艺、百牧万蛋、百豆千菽与百食千蔬等。

合作社经济：满足生计、生活与生命的社群实践

第二人生不只限于即将退休或退休人士，第二人生注重：

1. 多一点合作共好，少一点竞争比较；
2. 多一点“需要”，少一点“想要”；
3. 亲自动手，以小而慢的方式取回生活的主导权，找回时间的掌控权；
4. 活在当下，追求自己的热情与理想。

树合苑协助团结第二人生学员，借众人力量共同承担风险，以合作社经济方式创造规模分摊固定成本，建立长期稳定的供给端与需求端的经济合作，让第二人生伙伴们能创造更多机会与可能性，也让生命更加精彩丰富。

合作社不是“资本”的组成，而是以“人”为主体，然而单靠理念无法形成道德约束力来让大家合作，还需要按部就班的学习，建立合作组织成员的互信。树合苑举办多年的合作学包含：赛局理论（Game Theory）合作学；罗伯特议事规则（Robert's Rule of Order）：由下而上集体决策的会议规则；社群货币：促进社群互助合作的通货。

合作学不采用中央权威的老板或主管管理来强制合作，亦不用道德劝说，而是透过赛局课程的体验游戏，让社员体会互助合作与互动的关键，在利己主义的世界中创造双赢。

合作的基础是信任，信任的具体操作须先建立共议决策的议事规则，借由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导入，营造社员彼此尊重的文化、积极的妥协精神、权利的意识与理性的思考。

树合苑是在绿色生态环境里，让生产者与消费者相遇和对话的平台。在树合苑这个大家庭里，伙伴们不仅以合作社经济模式协力创业、共食、共学、激荡，而且有日常的生活互动，树合苑是实践可持续幸福生活的互助园地。在此期许每个人都能致力于个人成长，探索我们的使命，感受真正的自由，齐心协力让生活更美好。祝福大家！

■ 陈孟凯 台湾合朴农学市集召集人、树合苑创办人。

回家

我们在广东酷热的夏日午后出发，行驶在没有一棵树的高速路上，两边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厂房，然后是一片又一片的批发商城。驶进 K 镇，感受到熟悉的珠三角城镇那朴实中略显逼仄的道路尺度。街上一排排的商铺，几乎同属于一个行业，但不同的店名，再配上五颜六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广告牌和不停重复的促销广播，让人愈感炙热难耐。

下了车，进村，走过密密麻麻的出租屋，一条略显浑浊的水渠贯穿了村子。我们站在水渠边等彪哥，顶着明晃晃的太阳仰头看眼前的这些房子。哪一栋是彪哥的房子呢？在这曾经的珠三角水乡，现在的建筑似乎都长得大同小异，他的家会有什么特别？为什么会让我们来采访呢？

瘦瘦的彪哥走来，还是印象中淡淡的微笑和谦逊的打招呼方式。跟随着他从那昏暗的一楼爬上出租的二楼、三楼，我都还在疑惑此行的目的。直到看见眼前通往四层的木门——它的厚重感、手工感和天然中的一丝笨拙感，在静默中散发着能量，让我为之一震。

迫不及待穿过那扇木门，扑面而来的是光影斑驳的清涼，一种适度的阴翳，以及绿色植物所形成的呼吸感，我们好像突然穿过一扇任意门来到一片小森林一样。这种体验太特别了，起初茫然不知为何，后来发现彪哥的家是一个“回”字结构，外面的“口”建了一圈约 60 厘米宽的种植槽，槽中填土约 90 厘米深。在这“口”田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主力有桂花和月季，南瓜和青菜，还有一丛丛甘蔗，间或点缀着他去不同地方带回来的一些当地作物，例如罕见品种的柠檬、无花果、黄皮、金银花……我们光了解植物就花了一个小时。种植槽的高度恰好方便人站着操作，而坐下来的时候，植物的枝叶既屏障了四周的楼房，又展露了天空。

“(这个家)好像一个人在成长一样，有一种随着生活变化的感觉。比如第一年，其实也不是种，就是吃了南瓜，到处扔厨余，然后南瓜就各处长起来，整个屋长了几十棵，最后结了 36 个南瓜，都吃不完，第二年就不种南瓜，种了一些甘蔗，之后这里就全都是甘蔗。”

在这“口”字型的环绕式农田之内，是一圈“口”字形的回廊，回廊与外界由推拉窗分隔，当这些窗打开，风便从四面八方灌进来。这个家的客厅、厨房、餐厅并没有形成单独的明确房间，而是融合在被拓宽的回廊里。回廊的中间是楼梯间，左右是格局相似的两组厢房：起居室、卧室和卫生间，当推拉门打开，风和视线可以直接从家的一边穿透到另一边。回廊的上方是一排置物架，彪哥说这是从过去坐火



车得来的灵感：一整面的长窗边摆一个小桌，窗户之上是一排置物架。坐在桌边，三人对饮，看着窗外植物摇曳，仿佛坐着绿皮火车慢慢摇晃，驶向谈话中的一个远方。

虽然知道彪哥的家设计得很通风，但曾在广东顶层居住的我们，还是对此难以置信——烈日高照，却没有丝毫被炙烤之感。抬头一看，原来屋顶铺满了木板，两三层叠加，形成了一个30厘米左右高的空气层以及隔热层。不同于一般的“吊顶”方式，这些木板是直接像木地板那样铺上去的，如果拍张照反过来看，也许会产生一种上下颠倒的错觉。同时木板肌理形成的呼吸感让人觉得非常舒适，毫不压抑，跟整个家的木质基调，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

走进楼梯间和厢房之间的巷子里，又是一番绿意盎然，映入眼帘的是一排彪哥细心营造，将底部的树枝修剪掉后长到近三米的米兰。

“米兰就像是一片树林。下面这些鱼缸是亲戚不要了，我就把它们搬上来，养一些水草，然后放两条野鱼。你看，每一个缸里都会有一条野鱼，都很干净。它最大也就这么大了，但生命力很强，它在里面可以吃一些有机物。比如蚊子（的幼虫）之类，它就帮人类处理掉了。我发现有很多东西都要首先有个想象，有一种幻想，然后你再用你的聪明才智去把它营造出来。”

彪哥讲述着他对这个雨林的构想，我们站在树荫下，旁边是一缸一缸的水生植物，野鱼畅游其中。阳光从树叶的缝隙落下，在透明鱼缸中折射出一道道光束晃动，让人恍惚觉得身在水底。

“很多事情你（开始）做的时候都有局限性和很多的不确定性，因为我们都（带着自身的）局限去理解和去想象，而且当时的条件也有制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很多条件环境又有不一样的动态，又有一些新的思想、新的变化，就又要重新去面对它。其实这个是常态，只不过我们好像老是想一劳永逸，这都是自己欺骗自己。”

从2013年回到村里算起，彪哥像一只蚂蚁般地营造他的家，建材、泥土、植物，大多是他一个人爬楼梯一步步扛上来的，有请师傅，但很多地方他都自己亲力亲为，一切最初并没有清晰的设计，而是在生活和变化中缓慢调整，直到现在也还在变化。就像彪哥，住在这个房子里，房子和他一起生长，成为了今天的模样。

彪哥描述他的家时，用得最多的一句话是“这个是别人不要，我捡回来的”。家里的很多木头，包括一些牌匾、木门、家具都是在这十几二十年，遇到别人拆老屋建新房，他一点点收回来的。

“好多以前的老房子拆了，那些木料就不要了，很大一部分就堆到那些柴火木料里。只有一部分，被收旧货的人看到，就把它收集起来，供人挑选。收集这些旧东西的那个人年纪也比较大了，没有多少力气了，现在也不愿意去拖了，整个K镇，只有他还有一台这样的拖拉机。这些旧物没有多少人买，也卖不到什么钱，他的劳动强度又大，又要找地方存放，所以我觉得他也是出于兴趣或者自我内心认同的价值。”

说起“捡破烂”，还不只是一种兴趣爱好，这真的曾经是彪哥的

职业，也曾是K镇的一条产业。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珠三角各地都游荡着一些回收旧物的人。他们从K镇出发，骑着自行车去找可以回收再加工再利用的材料，通常都是金属类的，也是在这个基础上，K镇后来发展出了小电器作坊，后来又继续产业化，而这一切就是由收集边角料开始的。那时彪哥骑着一辆28寸的五羊牌自行车远行，车身经过改造，可以放三个大箩筐，载重量可以达到300斤。他收废品不只是在K镇附近，最远还去到广州和肇庆等地，全程骑车，过程长达几天，但对当时的他来说，千里迢迢跋山涉水不只是艰辛地讨生活，还充满了乐趣。他说，他会和伙伴比赛谁先到广州，也会在收这些五金废品之余去收他喜欢的老物件。

如今那些老物件非常自然地分布在他家的各个角落，例如一根挂在墙上的木棍，一头有角，乍一看以为是衣叉，其实是以前村子里干农活的扁担，如果遇到武斗，又可以变成震慑对方的武器。这些扁担用的是非常好的木头，拿起掂量，沉甸甸的。又例如左右厢房门上分别挂着两幅旧牌匾，通往他和妻子厢房的是“光天化日 大道同风”，而通向他儿子那边的是“物理翻新 人文造化”，文字别具一格，书法古拙有力。



彪哥收的不仅是别人家不要的东西，也包括家族里的不再被大多数人重视的物件。他家门厅墙中央挂着一根老床板的床楣，那是彪哥曾祖父的床，后来传给他的祖父和奶奶作为婚床，他的父亲和叔伯睡过，他们三兄弟也睡过，后来床搬来搬去，很多零件拆散了，只剩下这根床楣。“我觉得还是要保留一点，这是一个家族的传家宝。”彪哥说。

环顾整个家里的老木板、木家具、木质摆饰，我们问彪哥是否对木头情有独钟，他说他尤其喜欢那些未上漆的木头：“其实每个人都是自然的产物，你也知道你皮肤有微微的毛细管，当你接触有油漆的木头，你都会有一些闷，感觉没有那么透气，所以我休息的话就在这三块没有油漆的木板上，因为它表面可以呼吸。”

我们问他，你从小就喜欢亲近自然吗？彪哥略显沉思，开始说起他的小时候。

“那时候我母亲因为结扎手术后身体不好，不能够下地干活，（家里就少了一个劳动力）。我父亲就去申请，想开一个卖农副产品的店，但那时候副食店都是供销社的，不能够私人开，但他（19）79年就不断地去申请，后来批准了，那是（19）80年，你也知道，（后来就）开启整个中国的形势。”

所以K镇最早的小卖部可能就在彪哥家的后院。初中以后他没有继续升学，作为家里的长子，为了给家里改善生活，他很早就进入社会，尝试过各种工商业的工作，也加入了当时K镇收集五金废品的大军。K镇制造业兴起后，他加入过工厂，当过销售，经济条件逐渐有了改善。与此同时，他也目睹着K镇的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各种粗放型工厂的兴建，让附近再也没有了田，空气中充斥着刺鼻的味道，原来的溪水也渐渐被污染。加之父母的身体状况也开始恶化，这一切促使彪哥开始深入思考关于环境、健康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命题。

“（19）86年我去一个造船厂工作，当时有机会出差到广东肇庆的封开县，那边靠近广西，有原始森林，我在那边一个很偏远的农村睡过一个晚上。那里的夜晚很古老很厚重，有（大自然）呼吸的气息，满天看得很清楚的星光，走到森林里面树叶沙沙作响，随便在哪里躺下都能很安心地睡，随便在哪里喝水都很放心，所以回来（K镇）后就有比较大的感触。”

这趟邂逅原始森林的经历，让彪哥开始反思家乡的环境。他从电视新闻听到过环保这个概念，他想要学习更多，却不知道有什么渠道或资源。

2002年彪哥在一家工厂工作，他们所需的配件需要喷漆，喷漆厂会用一些废旧报纸包起来运到厂里。有一天，他在一张揉皱的报纸一角，看到豆腐块那么大的消息——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在广州办一场沙龙。那时候网络还不普及，于是他找到工厂的文员帮忙上网查找自然之友的联系方式，真的搜到了自然之友北京办公室的电话。他打长途过去介绍自己，对方很爽快地将广州自然之友小组的联络方式给了他，从此彪哥找到了组织。

2005年彪哥下定决心一定要从K镇出来学习。他去了广州，和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参与了很多跟社会和环境相关议题的学习和讨论。他也经常去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书店或旧书市场，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很多医学、历史、人文等方面的书籍，对他来说那段经历好像出国留学一样，给自己带来了很大的震撼。

去广州的代价是，抛下了工作，也暂时和家人分居两地。对于彪哥这几年的“消失”，家人很难理解。他甚至带岳父岳母去他广州的住所，证明自己并非在外面有了另一个家。到了2009年，为了帮父母治病，他离开广州回家。跑了很多地方，去过大医院也找过民间偏方，但父母沉痾难愈，相继离世。2013年，彪哥改造自宅定居。这段出走后的回归，让人想到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在《树上的男爵》中，讲述了一个男孩12岁起就栖息在树上度过余生，始终不愿回到大地上的故事。关于书的简介是这么说的：一次倔强的反抗，让科希莫从12岁起就决定永不下树。从此，他一生都生活在树上，却将生命更紧密地与大地相连。是不是真的只有先与人疏离，才能最终与他们在一起？

“要成家，要养育后代，要完成家里的一些任务，所以要赚钱，要盖一个房子，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和物质条件，让父母过比较好的生活。因为他们真的是非常辛苦地走过来，而且都是农民，也受了很多他们的父母那一代的苦难，所以我们的基因里就不断地刻上这样的烙印，有这样的内在动力去驱动你，去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给他们也好，给自己也好……（而我想做的事情只能）应运时间空间的不断流动，一点点地微调，按照自己有限的能力和条件。”

正如彪哥所说，每个人对生活的想象都脱离不开他们的局限性。

他总是保持谦卑，不断地摸索和调整。坐在彪哥家里听他讲述自己的故事，感受到他对于生活空间的营造是如何立足于具体的生活经历：他跟土地的连结、森林里的夜晚、“收破烂”的经历、在广州的“留学”，这些记忆最终都投射在这个充满细节的家里，它超出了审美和功能的范畴，总是处于未完成的状态，一切都在生长变化，仿佛一个鲜活的生命体。

从一个建筑师的眼光来看，彪哥的家是极为概念性的：在传统的中国家居空间中，私密空间常常围绕着公共空间布置，古时候有合院，也就是房间围合院子；当代的公寓也常常是房间围绕着客厅布置。在彪哥的家里，这种关系被颠倒过来，回廊作为公共空间环绕在外围，而卧室位于中心。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这样的空间格局是如何回应主人的生活习惯和时间分配，卧室只是简化到极致的睡觉场所，除此之外的生活——做饭、吃饭、洒扫、照料植物——都发生在这个连续的回廊里，同 60 厘米的植物森林、窗外的风景和阳光雨水保持了最大的接触面积。我们问彪哥是如何考虑这个房子的设计的，他一如既往地谦逊地表示也没什么设计。也许对于一个用自己的双手为自己建造居所的人来说，生活经验就是他的设计方法，而生活总是先于概念的。

那天下午在聊天的尾声，彪哥说起记忆深处一个关于榕树的故事：

“我母亲小的时候身体很弱，我外婆就带她去村里河边的一棵老榕树祭拜，认榕树叫娘娘，希望增强她的生命力。后来母亲经常带我们去外婆家，经过那棵榕树时就会跟我们讲她年轻时候的故事。所以我一直都对榕树有一种感恩，有一种心灵的共鸣，经过 K 镇无论在哪里见到榕树，我都把它当做母亲祭拜的榕树。读小学的时候，看到鸟会吃榕树的果，然后在不同的野地或者一些岩石的裂缝中就会长出榕树苗，我挖过几棵回来，种在我自己做的一个养金鱼的水池旁，想营造一个小小的微观生态。我有一种这样的愿力，希望以后有自己的地方，去种大一点的（榕树）。 ”

在彪哥不疾不徐的讲述中，我们似乎跟着那位少年回到了最初开始的地方，他的成长，珠三角城镇化的变迁，一个家的从无到有……太阳从高照到西沉，时光的故事在夜色中渐渐落下帷幕。说故事的人，听故事的人，以及故事里的人似乎在生命长河的这一瞬间同处于这个家里，呼吸着同一缕风。在静默的片刻，微风吹动草叶，光影摇曳，倦意朦胧，恍惚中这个房子变成一棵大榕树，和天地融为了一体。



■ 杨向若 舒米学苑内容共创官、旗溪村社区协作者。

■ 王慈航 建筑师，现生活工作于中山旗溪村。

都市人与自然环境的距离

2018年9月，台风山竹吹袭香港，为这个先进城市带来不一样的景象：海边翻起四五层楼高的浪，好些大厦玻璃幕墙被吹烂，整个工程天秤从二十几楼被吹倒下来……翌日，香港市民如常上班，但不少人发现自己屋苑的大堂堆满从海里冲来的垃圾，倒下的大树树干有两三人围起来那么粗，主要干道严重瘫痪，铁路不通。这次自然灾害，是香港三十年以来最大的一次。切身的影响，诱发不少人反思人和自然之间的距离。

容让其他生物光临的建筑

文一
阿乐



自然建筑在南涌出现的契机

朋友传来照片告知，香港的郊区受灾亦严重。在南涌，本来安置于鱼塘旁的货柜宿舍掉进塘里。另一处的货柜厨房被吹翻，导致形状扭曲，不能再用。还有更多农场的基建被破坏，需要重修。朋

友问：“你可以帮手重建吗？”我知道南涌这个位于香港偏郊的地方，有一群人为着生态保育聚在一起，成立了活耕建养地协会（下称协会），及后朝着生态社区教育的方向努力营建。我提出：“你们会想用自然建筑的方式重建吗？”就这样，我走进南涌。但在这之前不无一番挣扎。

为何选择离开现代建筑

我是阿乐。建筑系毕业后到香港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工作，开始了持续四年的规律：从市区的家出发，搭地铁，步行5分钟，到办公室的冷气房，开始8小时工作；下班以同样的路径回家。我最享受的或许是周末，因为可以到郊区行山。现在想来，为何我对每个周末都有如此强烈的渴望？不知会否有人跟我一样，往山林里跑，在大海中浮游，其实是在弥补生活中的某些匮乏。我想，如果是一条鱼，我会在大海里有怎样的一天？

我发现生活在城市的我们，很容易忘记在金鱼缸里的鱼，跟鱼塘里的鱼和大海里的鱼，本质上都是一条鱼。它们不是被观赏的鱼，不是被吃的鱼，它们是地球上的一员。

在工作的四年里，我尤其看到城市空间对这种共同性视觉的缺乏。市区的土地都插满高楼大厦，公共空间不足。在追崇高效的社会，空间都先让作功能性的使用。不说人要给车让行，而是要求容许其他生物共享这个空间，听起来像天方夜谭。

我选择放下“以人为本”的视野，离开建筑公司，先学做一条鱼，摸索是否存在着一种容许各生命体共融地生活的人类建筑方式。

在外地遇上另类建筑的经验

到哪里寻找答案？离职后的一两年间，我去了多个地方，并觉察到我在建筑业所观察到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问题还有更深层次的根源。

在巴西，我以实习生的身份，进入了当地政府的房屋部门。我被派往巴西首都巴西利亚的贫民窟，协助部门的公共空间设计工作。耗时三个星期在办公室做的公园设计草图拿到社区中心，迎来区内居民的回应竟是：“我们不需要公园，公共空间是犯罪活动的温床。”我察觉到这种建筑设计上的缺失。这种资本主导，从上而下的建筑过程，无法回应社区持分者的需要。而重大的问题是，目前这种建筑模式正主宰着很多地方的城市发展。

之后到印度的山区，我联同一个慈善团体为一个儿童之家改造厨房设施。该处的山区没有集中处理垃圾的系统，每个产生垃圾的单位都自行负责。如何负责？他们把垃圾拉到山边、路边、前院或后院露天燃烧。当中有大量不宜直接燃烧的物料，如包装纸、塑料等，一些对人体有害且让环境受损的气体就直接释放到大气中。大家都不以为意，现代的产品有太多是不可被循环或降解的。而鼓吹消费的发展模式，太容易使人忘记在过程中人应该承担的责任。不知不觉这种片面的价值观渗入世界各地文化。

接着在朋友的介绍下，我去了台湾参与团体“野地森活”的活动，协助建造一家用泥土做的小房子。第一眼看见这个正在建造的土房子，感觉不是特别壮观，又看不出有什么创新技术。参与过建造过程后我却被深深感动。土房子的建造不像现代建筑的建造。现代建筑建造地基的时候，不论建筑物规模，都会先把原本的泥土挖走，当工程废料送走，然后在土地上以混凝土封住，再在上面建一层又一层的楼房。土房子用的物料无毒无害，现代建筑的物料则经常有不少副产品产生：对环境和人体有害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刺鼻的强酸强碱等。土房子的建筑工地里，没有惯常见到的大型机械，或到处可见的危险物料。这种环境不期然使人放下警惕，容让来自更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人参与。台湾的朋友跟我说，这就是自然建筑。

在香港如何做自然建筑

自然建筑可以在香港发生吗？

自然建筑广泛的定义是指使用自然材料作为建材的建筑物。追求物料是在地的、低度加工、没有化学添加且可以逆转循环再生的。自然建筑同样关注人的维度，即重视在建造过程中，人与人（建

造者与使用者）、人与自然所建立的关系。自然建筑运动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美的回归土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所掀起，他们在没有建筑背景和资金的支持下，用在地自然资源作为建筑材料，建立自己的居所。

在工作之前，我亲身去过南涌三四次。我对这地方印象最深刻的，是三四小时往返市区的车程。直到一天，朋友传来电邮，说是邀请我参加南涌的市集，并附上照片一张。照片里是一片蓝天和一片绿意。远处的绿是山脊。山脚处点点白，似是一些小屋。前面的绿一时未认出来是什么，看见几个人在草堆里干活，应该就是一片还没长出禾的田。山和田之间也长满草，几乎看不出草是从水里长出来的。之后才知道那是芦苇。照片应该是初夏拍的，一片绿中隐约泛着夏日刺眼的白光。在电脑荧幕前看到这景象，好美。

没想到，自己由一位访客开始，接下了工作，到如今在村里生活。

工作开初，依然被南涌的自然环境和四时的景物所吸引。不时在劳累的工作过后，走到溪水里降温。南涌三面环山，水源充沛。涌口接连沙头角内海，海浪不大，岸边长满红树林。春夏的水很多，不少人长途跋涉从市区来，行溪涧看瀑布，看活跃于海岸、陆地和天空的昆虫等动物。秋冬留鸟和候鸟在溪边、海岸边觅食和停留，观鸟和生态爱好者经常流连。在城市长大的我，开始发现人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大。乡郊让我发觉，身边的环境有更多的物种存在，并以此为栖身之所。我要建筑的空间也许不只有人会光临。

人只是这片土地的其中一员。此刻承载着我们的土地，继承着过去的痕迹，亦将会是未来的资源。南涌自三百年前有客家人聚居，村落建于山脚，盆地用来种田种地。现在打开地图看，会发现鱼塘的面积比耕地要大得多。这个地貌的改变，源于1950-1960年间，田地变更为更有经济价值的鱼塘。之后到了2000年代，一反香港城市发展的大趋势，村中陆续有新的人口进驻。现在的南涌，常住的大概有五六十户。旧村民大多是退休年纪。活跃于村里的成员，有几户以不同生态友善模式种植的小农，还有做食物教育、身心灵活动的等等。

从2019年起，我以自然建筑的概念为基础，为这个新旧交融、背景多元的社区，尝试提出另类建筑的可能性。在过去两年多，我协助协会用泥土和竹建造了一个社区厨房，以及一个土窑。



厨房是协会每天都会用到的空间，成员普遍倾向以比较快的方法做一个临时厨房，并期望在未来的四五年间，协会的整体空间规划更为完整时，再另建正式的厨房替代这个临时厨房。南涌有什么在地的资源可作建筑用途？怎样的施工技术更为一般民众所掌握？我记起香港有名的竹棚，不论是几十层高的大楼的维修棚，或是每逢盂兰节打醮的戏棚，都能在几天内完成。在南涌，鱼塘就在旁边，泥土容易获取，况且有朝一日厨房需要拆掉，泥土也可以直接回归土地而不污染环境。南涌的另一个鱼塘则被芦苇覆盖，可以善加利用，除了用作在地材料，也可以削弱芦苇的蔓延和生长速度。考虑到时间、在地资源、使用习惯后，我提出了一个方案：用搭棚的方式做厨房的结构，草挂在竹架上面，涂上泥土造成墙身，芦苇用作屋顶和檐篷。

厨房的方案只是个开端，之后的选材、施工和保养，是持续而反复的实验、验证和修正，有如各种生命必经的过程。自然建筑追求的，不是把自然物料直接应用而不作任何人为添加或改动。如果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以类似的模式工作、运作或回应，我们就更像是一部机器，更不自然，不像我在自然中所见到的到处爬的

番茄、会游会跳的野猪或会穿州过省的候鸟。对周遭环境及物种有更深入的理解，在建筑时使用适切的物料配合技术，是我所理解的自然建筑。竹的韧性可与钢材相比。不过竹糖分高，使用前要花点功夫：经过火烤，可以将里面的水分蒸发，养分变质，昆虫不爱；泥土是很好的隔热物，不过弊端是遇水会溶化变泥浆。石灰涂在泥土上则是天然的雨衣，石灰氧化后可以保护泥土减少雨水冲刷。

对从前的我来说，大自然是一幅美好的风景画；乡郊是个休闲、消遣或放下的后花园；而建筑是制造满足人类需求的空间。现在大自然的生物是我会去探望的对象，让我时刻学习其强大的生命力；村里的人是与我一起聚餐、工作、生活的人，是互相聆听和支持的伙伴；建筑是在建立容让更多生命互相交流、共生的环境。

参与者的反思

两年间，有超过 100 人次协助建造。土窑复修则有 12 个人参与连续 8 天的工作坊。这些参与者来自不同的背景：有退休的建筑师、学生、家庭主妇等，年龄则由 18 到 65 岁都有。

自然建筑需要身体老实的投入，即使这种劳动使人汗流浹背或肌肉酸痛，但依然有人持续地做。过去一年有一群大学生每月最少来参与一次自然建筑活动。什么驱使他们持续到来？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喜欢这里能放空，休息，能放下一些负担和压力。”面对世界的崩塌和失序，不少人都有种盼望，希望回到如常。一位参与者分享说她在南涌的山水、农田与各位的分享之间，找到一份天地自然之律可以遵循，使人感到心安。

我相信参与者能从这种身体经历中获得一种回报：接收来自自然的疗愈力量。不论是在处理竹枝或是调配泥土的时候，经常看见参与者对当下工作的沉醉。或许，过往太多的学习是在追求知性的收获，现在通过自然建筑能与自然接触，促发的是心灵的触动。这种触动，也许是反思和改变的起点。

触动使人意觉人不再是独立的个体。人的关怀超越自我。曾经有一位土窑工作坊参加者反馈说，这种学习让她思考自己作为“人类”的身份，特别是自己在这地球上的角色。土窑完成后，另一位

参与者反思：“那烧柴开窑烘面包会用上很多柴枝又释出很多气体，会不会是很不环保的行为？”觉察人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又意觉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正是改变的开始。带着这觉察检视现在的系统，那我们又是否知道电力所产生的污染都排放到哪里去了？要建造如此庞大的电力基建，又夷平了多少村落，影响了多少家庭？

我下潜到大海里，寻找我心中乐见的鱼儿。我看见有一些鱼的容身之所就在海草或珊瑚之间；鱼成群地觅食；鱼的食物来自其他的生物，而它产生的废物和排泄物又成为其他生物的营养。鱼的生命得以维持需要依靠互相贡献、互相成就、合作和支持。这是我在一条鱼身上学到的。人为生活所需而消耗和建造无可避免，但我们在获取自己所需的同时，是否可以多一份对其他生物的贡献？我希望人类的建筑方式可以朝向更为低生态负担的方向发展。参与自然建筑的活动也许是让自己保持着这一份生态观念的觉醒：人与各种生物互相依存。当更多的人保持这份觉醒，积极地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行动，我们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环境就有改变的可能。



■ 阿乐 自然建筑实践者与导师，定居于香港南涌附近的乡村，除了建筑，有时还会跳舞和做面包。



zeitigen

生成

创作—吴美玲

第三部分

行动者

让孩子在爱中成长的共养村

“共学启动”源自几位勇敢的妈妈，希望在主流教育以外，实验一套更适合孩子心理发展的教育方式。在共学中，孩子不用一岁起就为上幼儿园作准备，爸妈也不用为考学校而备感压力。在亲密照顾者的陪伴下，他们可以自由地以五感和身体探索，以游戏来认识自己、社区、大自然和世界，并以家庭及邻里作为学习建立关系的起点，从生活的互动中观察及体验社交、感受互相尊重的关系，而非只有规范和约束。这股自发的微小力量，却不经意也为其他家庭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为孩子找朋友，原来不太容易”

我家小儿自一岁半开始，在街上遇到同龄孩子便很是雀跃，偏偏亲友中没有近龄孩子，我的朋友尚未生育，连和邻居的生活作息也对不上，总是没有可相约的孩子。

那便到公园吧！幸运的话，他会遇到主动领着他四处走的哥哥姐姐，但大家到达时间不同，往往在最投入时，其中一方需要离开，而照顾者常是家佣阿姨或长辈，不方便交换电话。即便对方是妈妈，初见时交换联络也困难，日后能否相遇也是随缘。更常碰到的是公园的小朋友都有本来的玩伴，没人愿意和小儿玩，他在公园转一转便欲离开。

“才两岁的人儿，如要有好朋友，是否就一定要上学或游戏班？”香港的教育制度不断改革，但仍走不出“精英制”的框架。主流教育的老师和学生间，教与授角色分明，规范化的课程未能配合所有孩子的需要和父母的期望。孩子需要群体，但学校或游戏小组的集体性和训练，对还在探索自我的小孩来说，未免过于约束。而碍于班中人数众多，老师难以有足够空间仔细了解或回应孩子的需要。



对于孩子成长，我坚信父母陪伴的重要性，也深信我们细心观察也能好好引领子女成长。

同时，作为长时间顾孩子的妈妈，日积月累的身心疲劳，有话无处说的憋闷，也让我察觉到除了孩子需要朋友以外，父母其实也需要伙伴。

“共学起动”的成立

有一天，我在朋友的社交媒体上看到征集“共学伙伴”活动，共学中，孩子和妈妈会定期聚会，轮流准备活动，一起共养小孩。这同时解决了孩子和妈妈社交的需要。在参考了朋友的共学简介后，我也开始了我和孩子的共学旅程，并在社交媒体中分享了我的经历。原本只是个人的小小分享，怎料却引来上百名的家长询问其他区域的共学组，原来有这种想法的并不是只有我和朋友两个人，于是，我们开始和几位热心妈妈走在一起，边做边学，一起开始构想如何推动共学，让更多家庭勇于并能够实践不一样的教养路。

虽然近年香港越来越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尝试推行非主流教育，但选择仍是稀缺又昂贵。我们接触共学之初，便留意到共学是经济而具弹性的另类选择，参与的家庭只要有决心，父母愿意花时间去寻找合适的伙伴，付出心思陪伴孩子成长，共学似乎也是不错的出路。有鉴于此，在2018年下半年，我们几位成员在有限的资源和人力下，用了短短一个月时间筹备“共学起动”网络平台，又举办了香港首个“共学分享会”。一个几近没有宣传、在平日下午举行的分享会，竟在短时间内吸引了近百位父母参加，让我们意识到很多家庭对于另类教育的渴求，亦强化我们推动“共学”的决心。

我们心目中的“共学”

共学并不同于在家自学，我们除了没有特定的老师，没有预设的课程内容外，也不受形式、地点和年龄限制。我们鼓励参与“共学”

的家庭连结在一起，按着团中孩子成长的需要和兴趣，由父母提供合适的环境和素材，让孩子可按个人兴趣自由探索，安于自己的步伐成长。

有两年共学年资的伙伴 Phoebe 曾分享她的经历和体验，“小儿参与共学时只有 10 个多月大，是团中最小的一位，哥哥姐姐们都见证了他由爬行到跑步、牙牙学语变成妙语连珠。在共学中，孩子从来不会有被迫参与或坐下的压力，活动也很多元化，我们 12 个家庭一起到大自然玩水、玩风、享受静心、参观博物馆、远足野餐、在中秋新年探访护老院的老朋友，孩子在满满的爱中成长。最难忘孩子还小时，我要背着他跟大家行山，其他家庭都轮流帮我拿其他行装，而因为哥哥姐姐们都在地上跑，我家小孩也由此愿意走了一大段路，让我轻松不少。即使现在大家的孩子都在上学了，在有空时也会相约共聚。”

实践探索过程中，我们逐渐就“共学、共玩、共养”的内涵达成共识，包括：

“共学”：家长与孩子间、家长与家长间、孩子与孩子间，互相学习。共学是集体参与，互相贡献、影响和成长。

“共玩”：孩子是玩的专家，玩乐是他们的权利。游戏没有目的，却能启发孩子。成人跟随孩子的方式去玩，与孩子连结，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自己也享受其中。

“共养”：尊重孩子发展需要，鼓励父母彼此分享教养方式和心得，共同学习，让彼此的孩子也能身心健康地成长。父母以身教而非言教、连结而非高高在上、设限而非管束为教养原则。尽量做到多聆听、少说理；多观察、少责备；多引导、少惩罚；多鼓励、少竞争比较；多欣赏肯定、少挑剔。

“共学起动”初期探索

起初，我们运用网络平台协助有兴趣参与共学的幼儿父母互相认识，组成共学小组。我们的成员会以义务顾问形式为小组开展和运作提供意见，并从中探究以共学为起点，发展出一套非主流教育模式的可能性。在短短三个月里，我们已在全港组成了 15 个共学小组。由于

我们大部分成员的子女仍在幼儿阶段，所以我们主力推动 0 至 3 岁幼儿家庭参与共学，一方面我们可以身体力行去尝试这种学习模式，另一方面 0 至 3 岁孩子父母亦较愿意尝试以共学作为教育孩子的起点。

参与一年多的伙伴 Fion 曾分享，“组成了自己区域的共学组，有一年多的时间，6 个家庭经历了由小朋友们互抢玩具到会期待见面玩耍，妈妈们由分享育儿琐事到分享育儿心事，爸爸们也有机会参与在孩子的活动中。我们还找到好旅伴一起共学到外地，所有美好时光都是由共学开始。现在小女儿一岁，我也毫不犹豫地正策划下一个共学旅程。”

经过一些传媒访问和报导，短短半年间越来越多父母想认识“共学”。有些家长会同时参加共学和坊间的游戏小组课程，借此更全面地了解孩子的个性。参加共学的家长亦发现共学能为孩子提供更贴近需要和丰富的生活体验，让我们更肯定共学的价值。

当然，“共学起动”平台成立至今也非一帆风顺，一直以来，我们面对着很多不同的挑战，例如资源和人力的不足，成员间不同的观点等。参与的父母对于持续以共学作为孩子长远教育模式的准备和认识不足，社会上也不容易找到支援小组活动的稳定场地，再加上过去两年，香港受社会事件、疫情冲击等，都让“共学起动”的发展变得十分困难。虽然环境因素为“共学起动”发展添了不少挑战，但同样也给予我们空间放慢脚步，集中建立核心团队成员的信任和共识，让我们更认真地思考发展策略和方向。在这段未能举办共学的日子，我们一起思考、沉淀和重塑共学理念和推动方式，亦令我们更体会到共学珍贵之处——它具有适应环境和人性的流动力，能让我们共同建设无限可能，各人投入不同理念、才能和能量，令共学发展更多面向。



以“共学”为起点，建立“共养”文化

受疫情的影响，在过去一年半时光，大部分家庭都无法再参与共学，也因此不容易再找到伙伴同行。在家中，孩子的精力依旧无限，爸妈在家工作同时照顾孩子，一方面可说是多了共聚的时光，却同时也难免出现更多磨擦。在面对孩子哭闹时，爸妈们倍感疲惫，耐性被磨灭，待孩子睡着后，又会后悔及责怪自己。

“共学就此要停下来吗？难道没有其他方式可持续支援父母吗？”在一次会议中，我们回归到共学的初心。推动共学的根本，除了是连结家庭和邻舍去教养孩子外，“相信孩子”、“连结自己”也是我们根本的信念。外在环境我们控制不了，而“人”是我们所能够影响的。经过沉淀及反思，我们决定从根本着手，让家长学习先好好照顾自己、滋养身心，容让内在有更广阔的空间、更坚定的力量携手走下去，去照顾孩子和面对不同的挑战。同时也借此吸引更多相同理念的同路人，待时机再次成熟，可让家长更易觅到共学伙伴。

因此“共学起动”开始善用网上资源，推出一连串以共养为主题的单向线上分享会，让家长能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寻找教养孩子的同温层。我们更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推出以季度推行的 Mom's Club，这是一个全新的线上双向活动，参加者会定期在线上聚会，除了认识不同的育儿方式，更重要是透过互相同理聆听，让大家能在无批判的压力下，分享育儿挑战或心得，学习与自己的内在情绪连结，多一点了解自己的需要，从而好好照顾自己。线下，参加的妈妈也会进行实体聚会，一起参与专属的艺术疗愈活动，不仅让身心得以放松，也善用这个网络得到身心灵的支援。

共学伙伴 Ailey 曾分享：“我参与实体共学团时，共学日是我每周很期待的聚会，甚至比孩子更期待。因为妈妈们能在当中一起分享教养上的点滴，互相聆听及支持，为自己充电。疫情后，我先后参与了线上的‘非暴力沟通读书会’及‘同理聆听共修小组’，这些小组的特质包含同理聆听、不批判、包容及接纳对方等，在小组里大家都能很安心分享育儿或生活上的大小事，有时大家不是为了寻求解决办法，而只是想要一双聆听的耳朵和耐心的陪伴。”

共学共养的未来

近月，我们看见更多有心人用不同方式尝试共学，他们对共学的理解和想法未必与我们一致，但我们相信共学已成为一颗种在父母心田上的小种子，等待有心人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继续培育。

我们相信，孩子都有面对挑战的能力。在共学中，我们只需按孩子身心发展给予适当的引导和空间，就能让孩子找到伙伴，共同学习，一起成长。在共养中，我们相信孩子的行为背后，都隐藏着美好的需求，只要父母身心安稳，得到同行者的支持，便能拥有陪伴孩子面对情绪的能力，成为孩子的避风港，让孩子得以健康全面地成长。愿我们能继续携手，一步一步为更多家庭成立属于他们的教养村落。



半农兴村：深沟村的故事

文
—
杨
文
全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网路时代，都市人的生活方式开始有了另一种可能性，同时农村也有了复兴的机会。在网路普及、交通便捷的年代里，半农半X的生活方式——一边务农、一边做着自己有兴趣或擅长的事——已经成为可能。而半农半X的生活者，也会为农村社会带来新的可能性。

半农半X生活者的农耕经济模式，由一群分散在各地的消费者所支持。这些消费者透过购买农产（加工）品，产地拜访以及参与各种农村体验活动，不仅支持了半农半X生活者的生计，而且能够为农村注入新的经济动能。这是网路时代下农村的社群经济模式。

然而，这种新的社群经济模式要在传统的农村发生，需要一个中介的支持环境。因为新的社群经济模式需要运用传统农村的各种生产资源，但是，又会遭遇农村既有经济体制的排斥。因此，这个中介环境，必须有效衔接两者，让资源互通，又能缓和或化解两者之间的冲突。



这个由半农半X生活者复兴农村的理论概念，并非单纯的抽象推论，而是源自笔者尝试解释过去20年发生在台湾宜兰县员山乡深沟村的实际案例。这个真实案例在十多年前就开始受到关心农村发展的台湾社会各界的关注：一个名为“穀东俱乐部”的消费者组织，支持当时年仅三十岁的赖青松与其妻子朱美虹，在此种植不使用化学农药的水稻，开创了年青人以新形态的产销模式入乡务农的先例。

事实上，在2000年到2002年，青松与美虹一家已经因为想要寻找更适合生活的环境，而从台北移居到宜兰。多亏当年电子邮件已经普及，青松可以在对外交通尚不便利的宜兰，为台湾西部都市提供日文翻译的服务，借此满足家庭经济的需求。与此同时，青松为了排解长时间坐在电脑前的工作压力，开始去深沟村，在丈人的两分半地上从事农耕。不料，其中一分半¹地的水稻收成后，青松

面临如何去化这些稻米的困扰。在传统有机通路无法支持的情况下，青松把这些稻米分送给亲朋好友，剩下送不完的稻米，好友何金富大哥就协助将其销售给自己的朋友们。意料之外的是，青松这两年的生活，为未来扎根在深沟村，借由亲朋好友的社群网络支持的半农半X生活，迈出了第一步。

2004年青松从日本留学取得硕士学位回来，决心正式投入稻米生产，在农村生活。有鉴于前一次稻米销售不易的经验，这回青松可是在种植水稻之前，就在何大哥的协助下，先把购买者找齐，并为这个消费社群成立了“穀东俱乐部”。穀东俱乐部最重要的产销模式就是预约订购。预约订购让农夫可以在投入生产之前，就确认所需要的生产面积。在足够的稻米预约订购数量支持下，青松可以安心地进行稻米生产，同时也确保了家庭经济的收入来源。有意思的是，青松不再是一位传统的农夫，他的主要工作不仅是从事稻米的生产，还需要花很大力气经营穀东俱乐部这个支持他的消费者社群，强化这个社群的认同感，以确保每年的稻米预购数量。

青松在经营穀东俱乐部的努力方向，主要着重农村生活资讯的分享，以及对农村认同感的强化。在前者，青松努力经营自己的部落格，将农村生活的点滴都记录下来，同时也经常会透过电子邮件直接分享给俱乐部的成员，称为“穀东”。至于每个月的田间生活记录，则以手写的“米报”随米寄送给穀东。至于后者，青松除了设计精美、富涵意义的稻米认购凭证“穀票”送给穀东，同时，每年都会依该年的总合心得，设计次年的年历分送穀东们。最特别的是，在每年的插秧、收割与冬至，他都会邀请穀东们回家，一起过节。

然而，青松进入农村务农的企图并不只是追求自给自足的生活，而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进入农村，带动农村的复兴。在务农过程中，青松不断地创造各种机会，带领有兴趣务农的都市人，进入深沟村参与农事。为了鼓励穀东们来到农村帮农，青松还特地租下了房舍成立“穀东之家”，以提供穀东帮农时休息住宿之需。青松也曾办过一分地农夫计划，企图直接培育新农夫，或将自己在深沟村租下的田地，再小量地尝试转租给其他已进场的新农夫，来测试深沟村民对于外来农夫的接受度。

虽然这些努力并没有促成新农夫留在深沟村务农，却让传统的深沟村逐渐开始习惯，外来的都市人在此从事不使用农药的新形态农业生产。简单地说，青松十年的努力，不仅为自己在深沟村找到立足之地，同时也为外来的新农夫打开了深沟村的大门。

1. 台湾计算农地面积的单位，一甲约等于14.55亩，一甲有十分，一分半约等于2.2亩。

2013年，在穀东俱乐部的基础上，以及政府水稻田休耕政策的改变，许多长年休耕的田地都必须开始耕种的历史机缘中，我所创办的“俩佰甲”新农育成平台，开始大量地协助想要务农的都市人进入深沟村生活。这个育成平台并非事先计划，而是我在人生半百之际，决定追随青松的脚步投入农村生活后意外的发展。

那一年，青松将远超过我自己所能耕作的两甲半水田交到我手上。许多深沟村的老农迫于政策改变，将长年休耕的水田拜托青松耕种，青松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将这些田地再转租给周遭可信任的小农耕作。在这些小农都无法再接收水田之后，青松把交不出去的水田都交给了我。这当然是基于我们俩已有十来年的互动信任关系，但我只是第一年进场的新农夫，其实没有能力独立照顾这么多的田地。而我明知无法独立耕作还是接下这么大面积的水田，也仅是基于情谊，必须力挺青松到底。

为了去化这么大面积的水田，我开始询问周遭的朋友是否有兴趣耕作水田。就这样，消息在宜兰的一个与小农连结的社会网络中传开来。此时，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来到宜兰，想要务农却找不到田地可耕。因此，当他们从这个网络打听到我手上有田地可以分租时，很快就找到了我。就像打开水闸门一般，都市人务农的浪潮涌进了深沟村。第一年春耕，我们有六位伙伴共同耕作这两甲半²田地，到了第二年底，已经有五十位伙伴共同耕作四十甲田地了。我们的伙伴基本上都是来自都市，想要过农村生活。这些伙伴中九成以上的年龄分布在二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

俩佰甲这个平台能够顺利地协助新农夫进入深沟村务农，有两个关键要件。第一，土地代租的管理平台。基本上，深沟村的地主会将田地租给他们可以信任的青松，然后，青松再把土地交给我管理，由我转租给新来的农夫。在这个平台中，青松对地主负责，而我则负责陪伴新农夫。第二，促成专属的水稻代耕系统。由于我们是新的外来者，又是采用不使用化学药剂的耕作方式，不适合直接运用现有的机械代耕，因此，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水稻机械代耕系统。在足够的水田面积支持下，目前由新农夫自己投入的水稻机械耕作设备，已经至少有两组以上的专业机械在营运。有了这两个要件，解决土地取得与机械代耕的问题，新农夫的社群才可能与深沟村的旧社群接轨，在此开启自己梦想中的农村生活。

令人惊艳的是，大量进入深沟村务农的新农夫，不仅为村子带来了活力，同时，他们自己原来在都市建立的各种专长或兴趣，也

为传统农村社会带来了新的面貌。有人在村子里开办农村广播电台，有人运用便宜的技术为村子建立简易的气象站；有人在做农村报导；有人在田里进行科学研究；还有一些新农夫在村子里开始经营自己的小店铺、餐厅、背包客栈等等，快速地为聚落中心带来崭新的风貌。在这个风景里，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了，半农半X生活者如何为传统农村带来新生命。



2019年中，我们成立了慢岛生活公司，希望透过结合新农夫们的多元专长，共同经营一个属于深沟村的消费社群。慢岛生活公司主要由我们几位合得来的外来小农，与几位宜兰在地——生活在小城镇或渔村的年轻人共同组成。这个公司的初始目标并不清楚，大家仅仅基于过去单打独斗的经验，知道必须相互合作才可能突破个人的格局，共同经营一个属于深沟村的社群，但是公司明确要做什么，并不那么笃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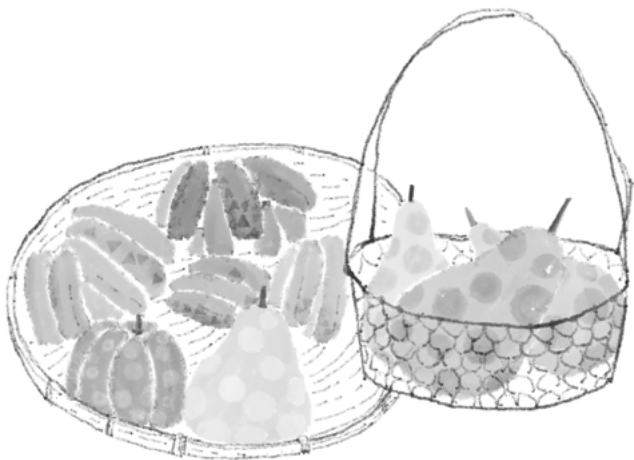
由于青松在深沟村的长期累积，结合众多新农夫的力量，慢岛生活公司第一年的经营，已经开始为来自各地的朋友们来深沟村拜

2. 两甲半约等于 36.38 亩。

访,提供各种客制化服务。这些服务通常是一到三天的农村生活体验,包含实际下田操作、餐饮、讲课、手作等等。同时,慢岛公司也透过“慢岛选物”,选择我们觉得合适的小农或农村产品,对外贩售,或是结合理念相近的店家销售。我们也尝试与其他的农场经营者合作,结合两方的农产,共同开发产品。

经过一年多的经营经验,我们越来越看清楚,我们其实正在经营的,是一个农村生活爱好者社群所需要的服务平台。农村生活的爱好者们可以透过这个平台接近农村生活,甚至由此真正地进入农村生活。而我们在地生活的小农与在地耕耘生活的伙伴,也可以透过这个平台为更大的社群提供服务。在明白了我们这个阶段的努力目标后,我们接下来的挑战就是,如何为这个平台建立专业化、标准化的商业服务经营模式。

我们认为,进入网路时代,新农业的驱动力来自服务化,而来自都市的半农半X生活者正是这个农业服务化最适当的推手。在深沟村的案例中,我们看到,在新的时代里,农村发展已经有了多元、丰富的可能性。事实上,在深沟村之外,台湾甚至是世界各地农村,早已有许多新的农村发展模式百花齐放。我们相信,原来依附都市的农村因为人们的努力,正在翻转它与现代都市的关系。新时代的农村样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人类的聚落生活方式,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第四部分

解读

我的城和乡——读《消失的城乡边界线》

文——杨金

从食物出发反思现代生活，鱼盐村在这条路上才刚刚开始，当我们越向深处探寻，越发现看似众多合理的背后，有许多十分值得深思的地方。在我们不断钻研食物背后的深意时，如获至宝地发现了《消失的城乡边界线——日本〈食通信〉的奇迹》¹，开启了透过食物理解城乡关系的新维度。作者高桥博之先生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对城乡关系的思考及深刻的洞察。

作为读者的我，经历了中国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也目睹了城乡的变迁对人们生活的塑造和影响。我借由食物梳理自己的成长，也期待能和大家找到背后的启发和共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生于东北的一个小城市。1997年开始，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我家从平房搬到了楼房。记得小时候，每年入冬之前，为漫长的冬季储存食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东北深秋的季节，家家户户门口都堆满了一片片的大白菜，远远望去，绿色的菜叶，白色的菜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有种彼此交错的美感。找个好天气，把酸菜缸刷净晾干，一层白菜一层盐，直到把缸完全填满，然后压上一块用了很多年的青石头，接下来的事情，就可以交给时间了。

冬天的食物储存是全家的一件大事，甚至整个家族都要一起——男性搬白菜，女性刷酸菜缸，孩子们也会被抱起来，放在酸菜缸上踩，因为据说小孩子踩过的酸菜会很好吃。随着我们从平房迁进楼房，从大家族变成小家庭，空间的变化导致没有足够的制作场地，而新的小家庭，也难以消耗一大缸酸菜。于是，做酸菜的人越来越少，去超市购买的人越来越多。

我发现，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越来越依赖消费来获取的模式中，从自己积酸菜到超市购买，从自家做大酱到买袋装的酱，从红白喜事一起劳作的流水席到去饭店吃席……换句话说，通过购买的消费变成了主流。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十分方便，快捷，无需复杂的过程和漫长的等待，只要想吃，随时都能买到酸菜、大酱等。食物的获取从未如此便捷，这样的变化之快，也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

我是个特别喜欢观察生活的人，我问妈妈：“你觉得自己做的酸菜和买的有何不一样呢？”她说：“好像少了些感觉。”追问之下，发现妈妈说的“感觉”，其一指的是味道，超市的袋装酸菜和自己做的，确实味道上有些许差别，但是差别是很细微的。其二是一起制作的那种感觉，这或许就是“方便后遗症”？



方便是有后遗症的，最大的体现就是“消灭过程，只要结果”。我们都知道著名的分工产生效能，当我们进入一个庞大的分工体系中，每个人只需要做到自己的一小部分，就能产生巨大的经济价值。食物的获取变得越来越方便，其代价就是我们都成为了整个大分工中极其细小的部分，而难以看到整体，甚至要凭想象把自己和最终的结果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丧失了作为整体的自我去感知整体世界的途径。为什么一些伙伴从零开始做手工会非常有“感觉”？这种“感觉”其实是对整体事物的知感，而非流水线的某个部分。这其实是作为一个整全的人，尤为弥足珍贵的部分。

很多传统的食物制作，都是我们作为一个自然人在和自然不断互动的结果，东北的酸菜，四川的泡菜，山东的馒头，陕西的浆水，内蒙的奶酪，浙江的火腿，山西的老陈醋，云南的腊肉和干巴，青海的酸奶，湖南的腐乳……都是数不尽的人间美味。回想一下，这些美味绝大多数是在自然环境中，为了更多地储存和延长食物储存时间所产生的。那个时候，我们的食物生产和存储是受到极大限制的，很有意思的是，在种种限制条件下人们反而创造了丰富的美味。

当我们谈到食物感觉的时候，首先跳出来的往往是味道，对味道过于注重往往容易忽略食物的其他维度，物质的食物也承载着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承载着家庭/社群共同制作的情感，也承载着联结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纽带。《消失的城乡边界线》一书中，

1. 《消失的城乡边界线——日本〈食通信〉的奇迹》，高桥博之著，肖俏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有个非常刁钻的角度，即从未谈及味道，让人们有意识地超越食物的味道，去看到之前很少关注的部分。

当我们从原有的食物生产和制作，进入到通过消费获取食物的生活中，食物越来越被“物化”，物的属性在不断增强，而联结和关系的属性在不断减弱。

快速便捷地获取食物背后的代价是我们和食物的接触面变窄了，原来吃上一口酸菜需要几个月的时间等待，现在只需要轻轻一点支付，就能吃上了。既不用辛苦劳动，也无需漫长的等待，似乎就这么嗖的一下，食物就做好了。当我们越来越习惯快速、快速、快节奏的时候，确实很难慢下来。

所以当我们谈起现在吃的食物少了些“感觉”的时候，我相信这些感觉里面必然包含着食物所承载的非物质层面，它们和物质的食物同样重要。

这并非是在怀古伤今，对现在的批判和想要回到过去。我想起小时候在东北，漫长的冬季只能吃到萝卜、白菜、土豆，对日复一日单调食物的恐惧还记忆犹新。当上世纪90年代种植大棚盖起来之后，也能在冬天吃到一些新鲜的叶类菜，是非常令人欣喜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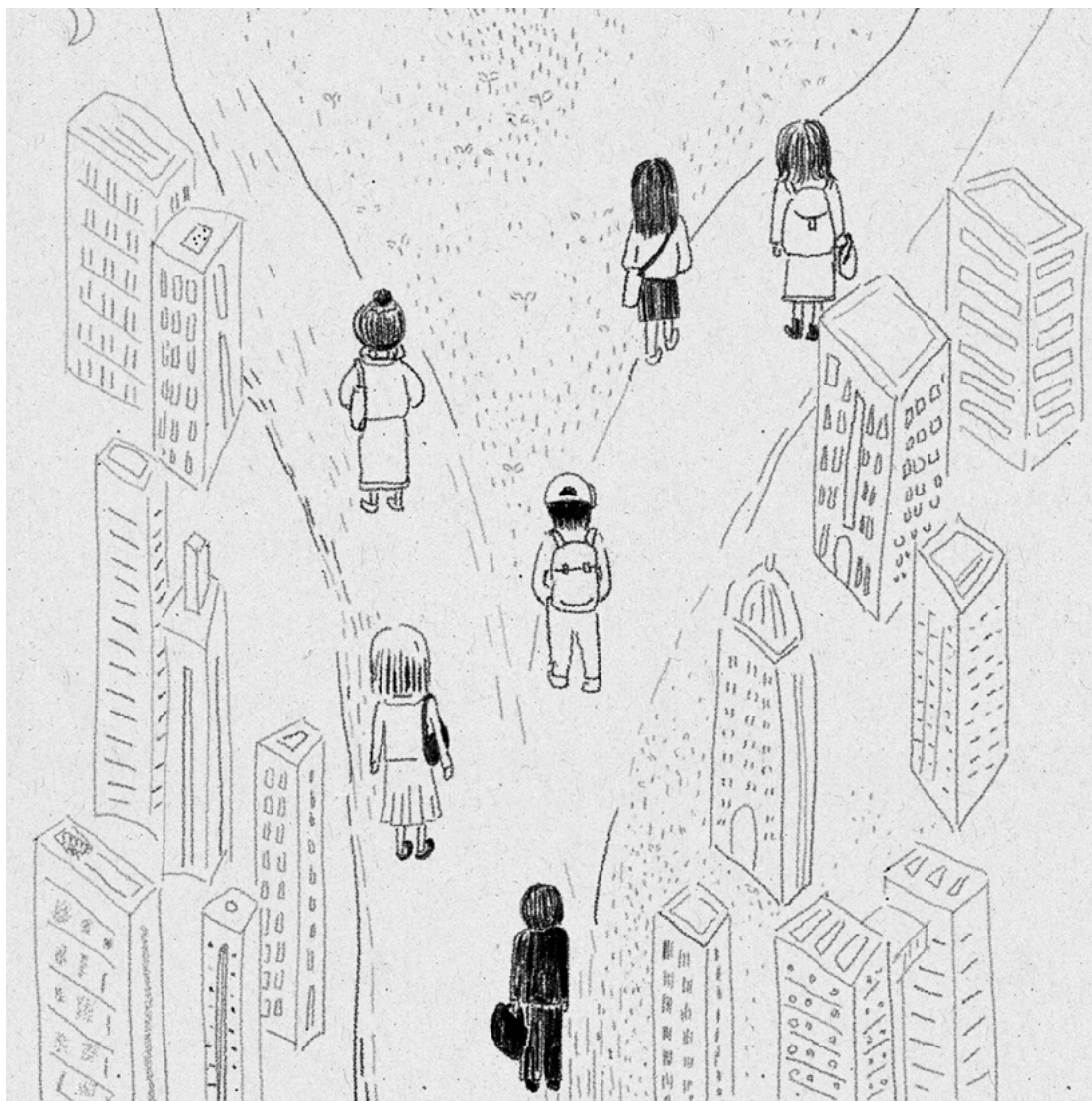
从共同制作到超市购买，从平房到楼房，从大家族到小家庭到个人，从一起操办流水席到去饭店吃，从昨天和今天的视角看，变化是极其细微的，但从30年的角度看，生活的变化是天翻地覆。个人从集体中被解放出来，从集体化发展到个体化，从社群互助的食物制作走向了市场化，这个过程中最显著的，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身份越来越凸显。除了满足日常生活的超市，最能代表消费的大型商场，也已经成为我们彼此联结的场域。而当生活依赖消费时，想过得更舒适，只有不断地赚钱。好像我们陷入了一个到处都需要消费，所以要拼命赚钱的循环怪圈里，这也是高桥在本书中提到的城市人的“牢笼”之一。

城市关注每个个体，开放包容，农村重视共同体，多有互助的传统。

随着滚滚洪流的现代化席卷而来，从上世纪70年代到现在，几乎所有人都被中国快速城镇化所裹挟着发展。我们需要去理解当下的生活，看见其背后都是被怎样的力量所推动，看见传统中抱残

守缺的部分，也看见现代化中讲究快节奏、效率至上的价值。而如何找到一条社群彼此互助支持，对自然友好，关怀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可持续的生活路径，需要慢下来，从我们每个人开始去探索 and 发现。

高桥先生在本书中提到城市人的第二个“牢笼”，说到日本进入了一个“脑力”社会。何止是日本，我的直观感受告诉自己，我们也在不自觉地拥抱“脑力”社会。如果把一个人简单地分，每个人身上都有自然人、社会人和经济人的不同属性。



自然人意味着我们都需要吃饭、睡觉、上厕所、打哈欠等等，是作为生物体的自然属性。社会人指我们是某个公司职员、部门经理，同时也有不同的家庭角色，是儿子、妈妈、爱人等。自从更关注生活之后，我发现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因为加班而没有吃晚饭，或者赶项目熬夜许久，向别人分享时，常会收到努力工作的赞许，却很少有人关心吃饭和睡觉。这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为了实现和承担我们作为社会人的成就与责任，极度压缩自己自然人的属性。不断压缩和牺牲自己的睡觉、吃饭时间，连吃饭都变成了和汽车加油一样，人们甚至会认为这是合理且正当的。

我坐网约车常和司机聊天，了解到他们早上7点就开车，中午休息一个半小时，一直开到晚上10点。他们在压缩自然人的属性，甚至也压缩自己作为父亲陪伴孩子的时间（压缩社会人的属性），只是为了尽可能地赚钱，把自己完全变成了一个赚钱的经济人。诸如此类，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每天都经历类似的生活。这背后是一种结构性的力量，有资本，有集体性的价值观，是非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这群人只是一种表象罢了。

换句话说，马克思所谈到人的异化其实从未离开我们，我们离开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中所揭示的流水线工人的异化，却进入了新的异化。自然人 - 社会人 - 经济人，是大圈套着小圈的，只有回到自然人，回到好好吃饭，好好生活，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我相信这是改变的方向。

有很多组织致力于让都市人跟自然建立更多连结，比如各种自然教育机构组织的活动，但我现在更喜欢的，是把自然嵌入日常的生活。我有一块自己的半亩地，每天收集厨余做堆肥，收集尿液做尿肥，集满后运到我的地里。堆肥可以改善土壤，尿肥是很好的肥料，它们帮助我收获各种食物。我能完整地感觉到，我的食物来自土地，我的厨余和尿液也反馈回土地，这是一个食物的循环，我也只是这个循环中的一部分，万物来自自然，回归自然。踩在土地上的生活，从未如此安心与踏实。

重新回顾此书，除了作者本身做的事情，也看到了作者作为一个生活者，自身的转变：从西装革履的议员到赤足走在东京的街头，从对政治无比向往到在城市中也总想找到一丝自然的感觉，高桥先生在城市和乡村之间往返，找到了自己。阅读他的文字，能感受到一种关于他自己的幸福。



■ 杨金 鱼盐村联合创始人、主理人，致力于通过食物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对人的模塑与影响，重建人与土地、自然和社会的联结。

在现代知识体系下，人类对经济的想象是“独立”的，表面上看它与生态毫不相干。但究根问底，经济活动的基础是大自然，是大自然给予我们赖以生存的空气、能源、食物……试着重新想象在关照自然的前提下，我们与其他物种共同而又别样的经济会是什么样？我们如何能让经济为人类也为地球服务？《经济，不是市场说了算：迈向幸福经济共同体的伦理行动指南》¹提供了世界各地对经济的不同想象、思考与案例，展现了世界各地的社区如何通过小规模的变化来创建更有道德的经济，同时政府和企业又如何支持社区的行动。本文作者陈怡桦和陈郁玲与我们分享了她们对本书的思考、感悟，以及目睹合作经济的一段生动经历。

劳动合作社：做自己的主人

文一
陈怡桦
陈郁玲

夺回经济

“人们夺回经济，让它为社会与环境服务，在探索人们夺回经济的方式时，发现人们深入地思考一些共同的关怀，包括我们如何生存得好？我们如何分配剩余？我们寻求好好存活之时，如何应对他人？我们消耗了什么？我们如何照料我们共有的资源？我们如何投资未来？”作者在导论里开宗明义地提问。

夺回工作：我们是为了工作而生活，还是为了生活而工作？何谓幸福？

夺回商业：在资本主义企业中，员工付出大量时间与心力，自然环境也付出代价，绝大多数的利润却都进入老板的私人口袋，这样的剩余分配方式合理吗？是否有其他选项？

夺回市场：在市场上，除了价格以外是否还有其他值得考虑的事情？我们的消费习惯如何影响他人与环境？

夺回财产：我们消耗了什么资源？我们如何维护地球栖息地与其他共有资源？

夺回金融：金融部门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然而今日其运作更像是个巨型赌场，而非我们财富的守护者，我们该如何改造金融，使其投资于我们共同的未来？



为什么要夺回经济

随着全球化与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许多人的生活因此改变了，强调竞争、利益最大化的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带来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尤其是财富的分配不均。回望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时期的景况，至今依然没有太多的改变，甚至演变或许更剧。“平等”是当时所有朝城市奔去成为工人的人们最深的企盼，岂料，阶级、贫富差距愈发剧烈；工业革命带来的财富没有公平合理地分配，绝大部分直接进了有产阶级的口袋，广大的工人苦不堪言，生活更窘迫不堪。

1. 《经济，不是市场说了算：迈向幸福经济共同体的伦理行动指南》（*Take Back the Economy: An Ethical Guide for Transforming Our Communities*），英文版由吉勃森·葛拉罕（J. K. Gibson-Graham）——澳洲西悉尼大学的经济地理学家凯瑟琳·吉勃森（Katherine Gibson）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已故教授茱莉·葛拉罕（Julie Graham）的共同笔名、澳洲纽卡索大学地理学和环境研究副教授珍妮·卡麦隆（Jenny Cameron）与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州立大学地理学系助理教授史蒂芬·希利（Stephen Healy）共同完成。繁体中文版由周睦怡译，2021年3月游击文化出版。

也许正如同书中的描述，“商业机构是生产与交换商品和服务的组织。对某些人而言，商业机构是丰厚个人报酬的来源，但对其他人而言，这是个受苦和受压迫的场域——一个充满剥削的地方。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商业机构只是一个工作和谋生的地方，一个索要他们清醒时最美好时光的环境。”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合作运动在英国成形。在英格兰北方的罗奇代尔（Rochdale）小镇，28位纺织工人前后花了三年时间，于1884年12月成立了“罗奇代尔公平先驱社”（Rochdale Society of Equitable Pioneers）。自此合作运动在英国扎根，并开枝散叶至今。

回到“夺回经济”这个主题，诚如导言的标题，为什么是现在？本书中提到其中一个说法：现代人普遍正在经历漫长的工时和工作天数损害生活品质和健康状况；就算收入增加，幸福感并不会提升，反而下降。工作占去了多数人的生活中很大的比例，如何有意义且愉快地劳动，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作为一个信奉合作经济的人，一页翻过一页试图寻找答案的同时，心里浮出曾经采访过的故事，以回应第三章“分配剩余”的主题。



“我们都不想当老板”

1995 年，国际合作联盟（又称国际合作社联盟，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在英国曼彻斯特举行的第 31 届会员大会中，确立了现今通行全球的《合作七大原则》；同时也确认：“合作社为人们自愿结合的自治团体，运用共同所有与民主掌控的‘事业’，以实现共同的经济、社会与文化的需求与期望”。

2016 年的一趟采访，其中一站到了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这个故事要从当时由五位女性组成的 Belfast Cleaning Society（简称为“BCS”）开始说起。2012 年 5 月，BCS 是北爱尔兰第一个立案的劳动合作社。时至今日，让我印象最深的片段是，在场的四位社员聊起那次赚了钱的“分配”和“没有老板”。

“合作社的稳定大于个人的分红奖金。”社员 Alice 谈起 2015 年圣诞节前的例会。“我们一共有多少钱？”大家问负责财务的 Alice。“付完这个月的薪水，缴完税，买完清洁耗材和待添购的办公设备，还有两千英镑的净盈利！”Alice 一边查帐一边向大家报告。“我们太厉害了！来办个 Party，分奖金吧！”大家在现场一阵欢呼中七嘴八舌。最后的决议是，保留 1400 英镑放回公共基金作为未来的备用金，每个人获得 100 英镑的奖金。对 BCS 的社员而言，社员既是拥有者（Owner），也是劳动者（Worker），也是理事（Director）。理事主席每年改选，Teresa 是现任的理事主席（Chairman）。Alice 连忙说：“是 Chairwom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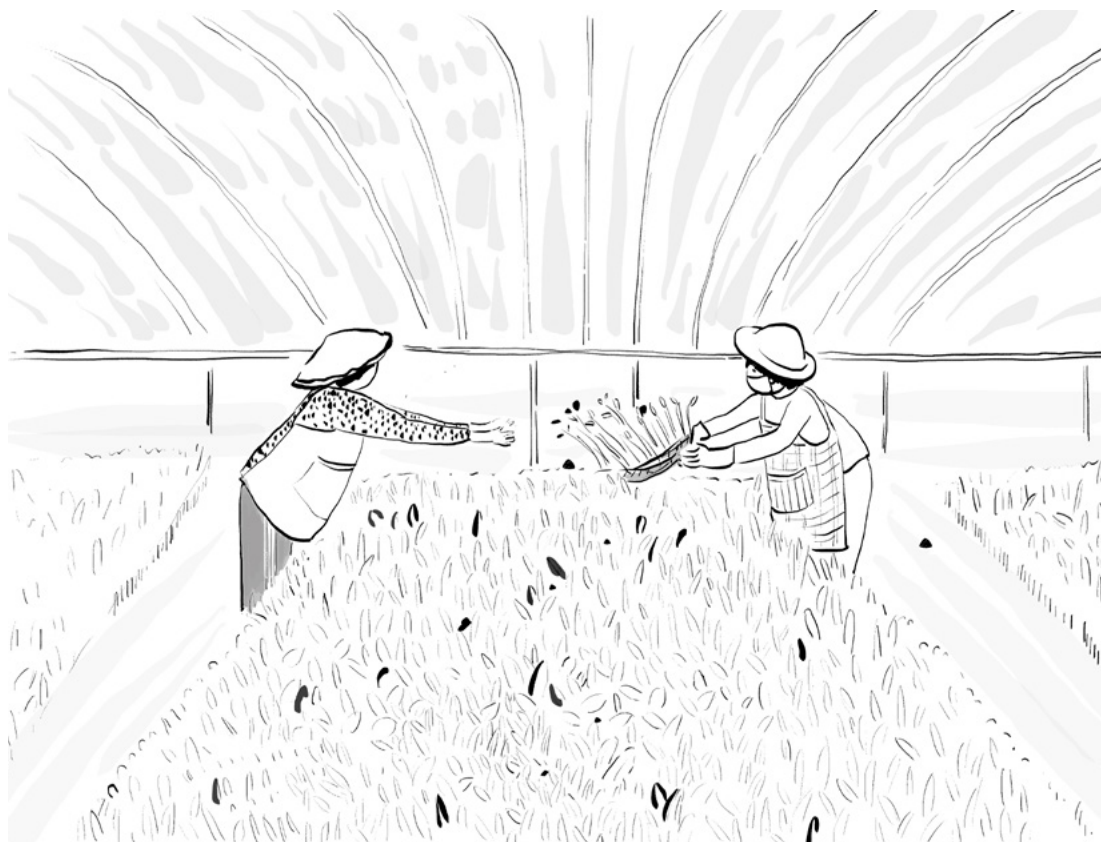
工作有潜力成为快乐和意义的来源，但工作也可能是乏味的苦差事，可以是重复的、耗费体力的，而且低薪到几乎不足以糊口，甚至可以接管人们的生活。

BCS 一直是 Living Wage（生活工资）的倡议者与实践者。2016 年 4 月，英国政府将基本薪资调整为每小时 7.2 英镑，但早在二月之前，BCS 经讨论后决议时薪为 7.85 英镑。“合理的薪资，让社员更有自信。”7.85 英镑的时薪水准，高于当时的国家规定。曾在清洁公司任职的 Teresa 谈到，以前的工作很多，薪水却很差，而今和家人或亲友谈到自己的工作，更有信心。此外，BCS 的每周保证工时为 16 小时，但根据业务量，通常是 25 至 30 小时。

BCS 的试用期为六个月，成为正式社员前的身份是雇员，薪水与社员相同。社员必须参与例行会议，协助宣传工作如上街发传单等。“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一起分担所有工作，权益和义务都是保障。”采访过程中，Alice 重复了许多次。对 BCS 而言，“一人一票、人人均权”是合作社的根本精神，而每个人的声音都有同样的价值。“我们都不想当老板，也不想管人。我们也不想将成员分类，我们希望每个人都拥有一样的权利。每个人都是社员，没有雇员。”年纪最小的 Josephine 说得很坚定。2016 年起，BCS 决议，六个月的试用期后，不愿意成为社员则无法续聘，且只有社员能分配结余奖金。Alice 又说：“我们希望真正做到共同决策，没有分别。”“有些伙伴只想工作拿到该赚的钱就好，不想参与社务。他们都是很好的雇员，但我们更需要的是能一起投入事业体运营的社员。”Josephine 有点惋惜。

2014 年加入 BCS 的 Teresa 是一位抚养七个孩子的职业妇女。“我很享受成为社员，很享受和大家一起工作，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一个会为彼此着想的团队。”对 Teresa 而言，在合作社里的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共同分担责任和风险，合作社赚钱也是自己赚钱。

总觉得“快乐天堂”这首歌属于劳动合作社！歌词里有这么一句：“有哭有笑当然也会有悲伤，我们拥有同样的阳光”。分工合作互助扶持，是劳动合作社的必然。劳动合作社的存在，是尝试用更平等、与每个人更靠近的方式面对及解决组织运作时最恼人的人与事；让每个人都要赚到该赚的钱，平等分配一切。这亦是回应本书中好好生存、合理分配剩余，更能善待他人的一些可能；也如本书所文，“夺回经济不是单一个人的任务。这项任务请求许多人共同协力行动”，欢迎成团结伙的平等组织，一起迈出夺回经济的一小步！



一些眼中
有光的人——纪录片《信仰之岛》观后感

文一 汪斌



我出生于鄂西的一个小山村，记忆中，村寨的大人们从田间生产到民俗生活都流行换工互助，小朋友们常常三五成群，结伴玩耍于山谷田野间，童年记忆一片热闹明朗充满希望。此后进城求学十来年，乡村生活离自己越来越远。

工作后的我得以继续穿梭在中国西南的诸多村寨。但在经济与市场浪潮裹挟下人员大流动的乡村，早已不是记忆中的模样：田地半耕作半荒芜、只有老少隔辈与带着幼儿的少妇们在家、大部分时间都很安静、公共卫生基本无人问津……加之当时我负责的项目找不到着力点，这些都让我逐渐陷入深深的困惑中。

那两年，我一度很不喜欢拍照和照镜子，因为害怕直视自己那空洞又疲倦的眼神。转折点发生在一次偶然跟随申顶芳¹老师走访他工作了十几年的西双版纳布朗社区。

一进章朗寨门，申老师就忍不住开始介绍他与寨子的渊源，能感受到他那种兴奋与思虑掺杂，如同对故乡的牵挂的情感……过缅寺，上一小段坡，就到了申老师在章朗的骨干伙伴岩章往大哥家的院子里。往哥的妻子在一楼，只是很平常地说“回来了噶”，就去忙自己的了。我们在申老师的带领下自己上二楼，往哥摆手招呼我们进去坐下。一切都像迎接白天出门干活晚上回家的自家人一样，这样日常的、淡淡的接待让我生出不少好感。

岩章往大哥与申老师交集很早，两人早期以拓展布朗文化中“赎”的内涵与外延为探索方向，开创了布朗项目的新局面。这次走访的几天里，两人不断热烈地讨论各种问题，包括义务教育政策下维持缅寺教育的困难，以及把老傣文佛经汉译以方便学生理解的做法之得失等。他们讨论时我在一旁总是听得津津有味。往哥说话时眼睛习惯盯着前方地面，偶尔抬眼与我目光对视时，眼神中透出的那股不紧不慢、坚定又祥和的力量足以穿透我的内心。我看见他的眼中有光！

这次走访对我的启发很大，让我打破对于乡村要么过于浪漫要么过于悲观的迷思，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一个个具体生活在乡村的人身上，尤其是那些从眉眼神态传达出智慧与力量的人。从这些人的思考、选择与行动中，我似乎窥见了乡村持续不断的生命力。在随后的乡村社区发展工作中，挖掘和陪伴村寨骨干成为我非常重要的思路，并且通过关注自己和村寨伙伴在不同时间透过眉眼神态传达出的身心状态来预估项目成效。鼓舞人心的是，我的工作有了新面貌，我得以再次真正地走进乡村，认识诸多令我钦佩、眼神明亮的乡村朋友。

同样令我深受触动的，还有来自远在印度尼西亚的眼神。在观看纪录片《信仰之岛》²后，片中那略带沉思却无比明亮的眼神和神态多日一直留存在我的脑海，触动了我的记忆，与我过往生活经验中接触过的类似眼神相交汇。

全球气候变暖、海平面上升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极为复杂的环境气候变化，越来越成为人类生存所需直面的挑战，这些挑战与近一个世纪的工业化膨胀发展、人类生活不断物化息息相关，问题的解决之道考验着人类的智慧与心性。纪录片《信仰之岛》将镜头聚焦于群岛国家印度尼西亚，从岛屿、沿海、山区到城市，从印度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到原住民万物有灵信仰，综合考虑印尼的环境和文化多样性特征，并且结合全球气候变化的量化数据辅助说明，讲述了印尼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不同信仰的群体如何利用各自的智慧以保护环境为前提从事可持续生产生活的七个故事。

1. 申顶芳，农村社区工作者，昆明市呈贡区梦南舍可持续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2. 《信仰之岛》（Semesta），印度尼西亚纪录片，导演Chairun Nissa，2020年上映，透过纪录印尼七个省份的信仰和文化，呈现致力应对气候变迁的多位人物故事。

七位“主角”的讲述中都有对各自文化信仰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内涵做出当下的阐释，以此为基础，我们可以看到七个案例故事虽然存在文化、信仰与地域的差异，实现人与自然的联结与平衡却成为了彼此共通的行动目标。

片中有几位“主角”各自扎根一片乡土，担起一个村寨/社区行动带头人的角色，令我钦佩不已。要担起带头人的角色，不仅个人能力要突出，还需要极强的责任心、公益心和协调人事的智慧。

上世纪，婆罗洲的森林因砍伐活动消失了一半，在全球范围内，此过程的排碳量引起气候变化总量的百分之十五。在这样的背景下，居住在西加里曼丹省尤缇克河流域的一个原住民团体，选择与森林平衡相处对于全球气候调节有着重要意义。团体的首领倡导保护环境，坚持自我管理自己的森林领地，与周边不保护森林从而一无所有的村庄相比，他们的森林依然像“超市”一样为他们提供各种生产生活物资，他们可以狩猎，可以种植，泉水干净……对他们而言，拥有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而是长远的责任：“森林里的一切都属于我们，因此我们要保护它……从森林里采集必需品是有规矩的。”

类似的责任感也闪耀在传教士 Romo Marselus Hasan 的眼中。位于东努沙登加拉县比莫林的村寨交通闭塞，与无法进入印尼电网的160万户家庭一样，多年来通过发电机和油灯解决照明问题，这样的能源利用方式，不稳定也不环保。六年前，传教士 Romo Marselus Hasan 带领村民们开发了微型水电站，利用自然的水流发电，是一种零排放能源。不料该村遇到罕见洪水，水电站破坏严重，如何解决困境？从灾情勘察，教委会协商，到召开群众大会讨论修复方案。最后，在一些骨干的引导下，村民们决定用自己的力量来修复受损的水电站，而非消极等待外来的帮助和救援。当全村之力聚集，为维修水电站而搬动一块大石头，或排成长龙运送石块时，传教士 Romo Marselus Hasan 坚定的声音响起：“地球上的一切都是上帝的造物，因此我们要彼此照应……”

但只有责任感有时候并无法解决困境。在亚齐省帕梅，失去自然栖息地的大象进入人类的村庄，村民的花园被毁，农作物全无。当地的宗教领袖 M.Yusuf 带着村民一起祈祷大象不要继续破坏村里的庄稼。M.Yusuf 洞见了现象背后的本质，“大象走进我们的村庄，吃掉我们的谷物，是因为我们夺走了它们的食物，我们把河岸变成花园。”祈祷开始前，有村民提出只有两种办法——毒杀或者猎杀大象才能阻止事情再度发生，M.Yusuf 表示反对。虽然祈祷活动继续，可是，人



象冲突已经存在，要实现现实利益与精神信仰之间的平衡着实不易，M.Yusuf 只能凭借人类要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信仰，尽己所能地向村民们传递一个信息，让他们不要制作陷阱伤害大象，不要毒杀大象。这个案例以 M.Yusuf 为村里的小朋友讲解人如何换位思考与大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结束，循循善诱中，M.Yusuf 的眉眼之间露出笑意。

即使隔着屏幕，我也能感受到这些人对社区的关怀，对自然的敬意，对家乡的热爱，让我也从某种意义上更贴近自己的家乡，更理解家乡的人。比如，我的父亲近几年结束外出务工生活回到家乡，并且逐渐承担起村寨“执事人”（红白喜事的总管，需懂民俗礼仪懂人事调配，愿义务为乡邻服务）的角色，每每与他聊到家乡人情世故、民俗发展时，我亦从他眼中读出类似的光亮。

作家三毛曾说：“大家都在种麦子，那么我就来种玫瑰吧……”是的，相对于随波逐流种“麦子”的大多数，种“玫瑰”者多少显得有些异类，但当你真心选择了种“玫瑰”，当你打破资本经济单一逐利的藩篱，扎根一片土地抑或一群人，做出的选择中有更多的利他性和自然性时，久而久之，内心充满力量的你，眼中又怎会不散发出光亮呢！

■ 汪斌 云南大学民族学在读博士，长期在中国西南山地行走，2015 年加入云南乡村之眼团队，有五年半的少数民族村寨可持续发展项目协调经验。

